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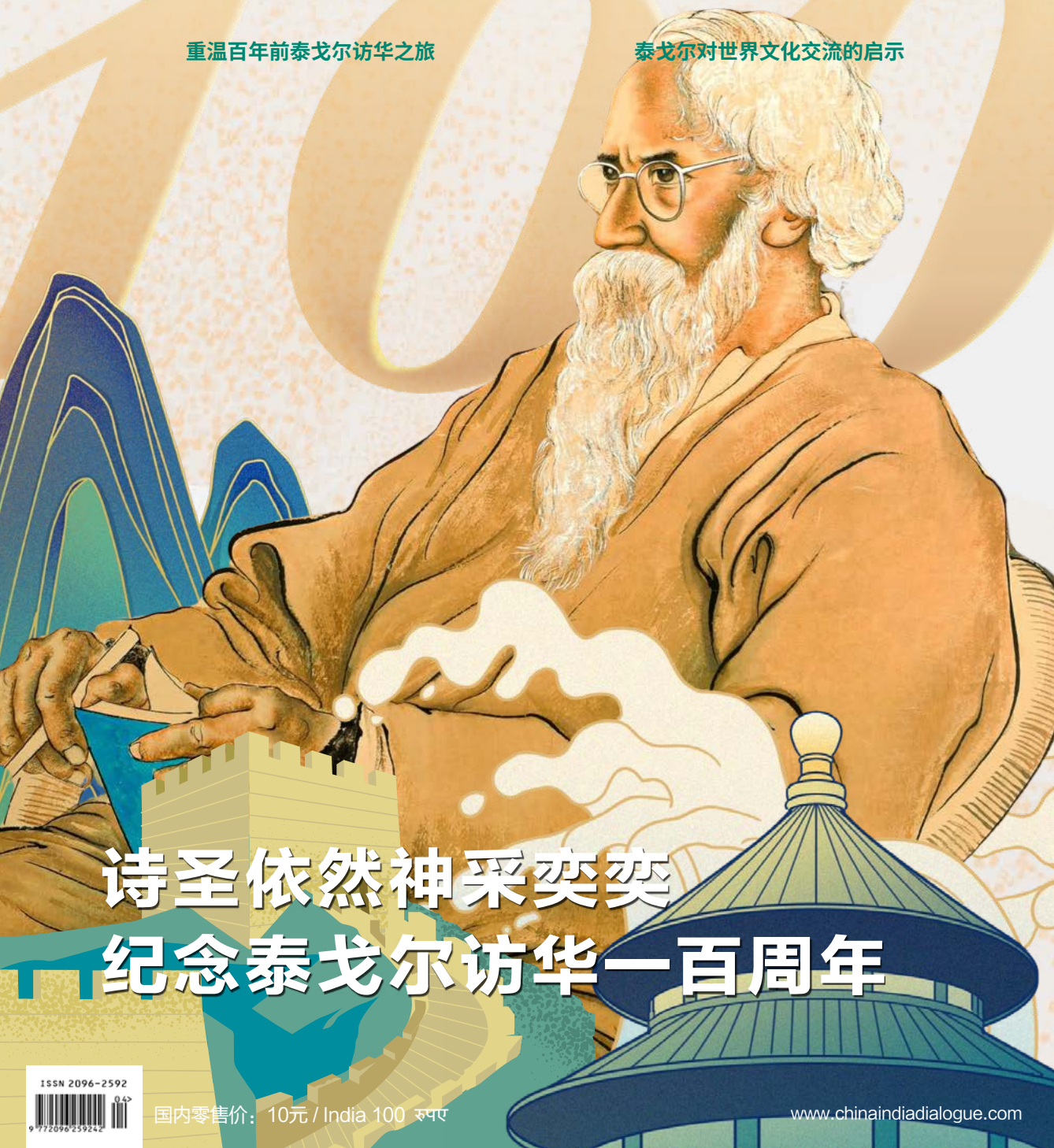
CHINA-INDIA DIALOGUE

中印对话

2024年第1-2期（总第38期）

重温百年前泰戈尔访华之旅

泰戈尔对世界文化交流的启示



诗圣依然神采奕奕
纪念泰戈尔访华一百周年

ISSN 2096-2592



9 772096 259242

国内零售价：10元 / India 100 रुपए

www.chinaindiadialogue.com

塞罕坝

牢记使命 艰苦创业 绿色发展

半个多世纪，三代人耕耘。

沙地变林海，荒原成绿洲。

寒来暑往，

塞罕坝机械林场的森林覆盖率

已达80%⁺，

栽种树木按2米株距排开，

可绕地球赤道2圈。



目录

大事记 / p.02

开篇辞

以崭新的历史视角
推动中印关系开启新时代

04



多极化世界中的中国和印度 / p.07

评论 从淄博、哈尔滨到天水，中国文旅进入 3.0 时代 / p.10

战略 中印关系在低位徘徊中向难而行 / p.12
中印合作具有良好基础 / p.15

聚焦 从印度大选看印度教民族主义 / p.18
大选后的中印关系或将呈现波浪式发展态势 / p.22
印度大选之后的中印关系前瞻 / p.24
印度大选即将揭晓，印人党或将连任? / p.28

案例 职教搭桥，沟通民心——印度鲁班工坊的故事 / p.32
脱贫攻坚的中国经验 / p.35
魏凤江：中印文化交流的桥梁 / p.38
为什么中国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 / p.40

论辩 重温百年前泰戈尔访华之旅 / p.42
诗圣依然神采奕奕——纪念泰戈尔访华一百周年 / p.46
泰戈尔对世界文化交流的启示 / p.49

数据 电动新视界：2024 年电动汽车发展展望 / p.52

青年声音 新能源汽车：驶向可持续未来的绿色引擎 / p.56

专栏 忆新疆之旅 / p.60

阅读 泰戈尔的中国缘 / p.62

中印对话

主管：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中国国际传播集团）
主办、出版：中国外文局中东欧与中亚传播中心（人民日报社）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33号
邮箱：contact@chinaindiadialogue.com

社长：姜永钢
编委会：姜永钢、鲍林富、于佳、黄守业、王烁、云霞
执行主编：于佳
社务总监：游珊珊
新媒体运营总监：乔振祺
编辑部主任：乔振祺
业务总监：赵月
业务主管：胡周萌
英文定稿：刘海乐
语言顾问：苏格
编辑、翻译：卞秀红、胡周萌、高默、刘海乐、李卓希、刘易斯、刘畅、王舒雅、袁梦、赵月、周昕、梅特里·夏尔玛、德伟

视觉编辑：李卓希
新闻采访部主任：段巍
设计部负责人：迟淼
设计制作：刘佩瑶、张也
订阅电话：(010) 68412660

法律顾问：岳成
印刷：北京利丰雅高长城印刷有限公司
刊号：ISSN 2096-2592
CN10-1432/D
邮发代号：82-209

国外总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北京市车公庄西路35号，第399信箱，100048
电话：+86-10-68413849
+86-10-68412166
广告许可证号：京海工商广登字20170199号
出版时间：2024年4月
定价：10元

《中印对话》顾问委员会（按拼音字母排序）

艾嫫伽 (Alka Acharya)
印度中国研究所前所长
达尔瓦尔·德赛 (Dhaval D Desai)
印度观察家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副主席
胡仕胜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南亚东南亚及大洋洲研究所所长
李稻葵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林民旺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
马加力
中国改革开放论坛战略研究中心副主任
马为公
北京大学国家战略传播研究院顾问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原副总编辑
穆库尔·桑瓦尔 (Mukul Sanwal)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前资深顾问
普拉文·萨哈尼 (Pravin Sawhney)
印度《军力》杂志编辑
阮瑞山 (T. C. A. Rangachari)
印度辩喜基金会高级研究员
印度前资深外交官
苏廷德拉·库卡尔尼 (Sudheendra Kulkarni)
中印巴合作“新南亚论坛”创始人
孙士海
中国南亚学会原会长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研究所原副所长
孙玉玺
外交部阿富汗事务前特使
中国驻印度前大使
塔伦·维杰 (Tarun Vijay)
印度议会印中友好小组主席
印度联邦院前议员
杨漪峰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亚非语言节目中心
印地语部主任
张文木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
研究中心教授

本期广告

公益广告……封二 公益广告……27页 公益广告……59页
形象广告……封三 形象广告……封底



扫描二维码 关注公众号

中印对话

2024年第1-2期（总第38期）

www.chinaindiadialogue.com

中印举行边境事务磋商和协调工作机制第 29 次会议

2024 年 3 月 27 日，外交部边界与海洋事务司司长洪亮同印度外交部东亚司联秘戴国澜在北京共同主持中印边境事务磋商和协调工作机制（WMCC）第 29 次会议，两国外交、国防、移民等部门代表参加。

双方积极评价中印边境局势管控取得的进展，就下阶段工作思路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同意聚焦边境现地有关问题，早日达成双方都能接受的方案，推动边境局势转入常态化管控阶段；同意继续保持外交军事渠道沟通，完善谈判磋商机制，尽早举行新一轮军长级会谈；同意严格遵守双方达成的协议协定和有关共识精神，避免现地局势反复，继续巩固前期脱离接触成果，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

中印举行第二十一轮军长级会谈

2024 年 2 月 19 日，中印两军在莫尔多 / 楚舒勒会晤点中方一侧举行第二十一轮军长级会谈。双方就解决彼此关切的边境现地问题进行了积极、深入和建设性沟通，同意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继续通过军事和外交渠道保持沟通，尽早达成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实现边境局势翻篇。在此期间，双方同意维护中印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

国防部：印方应停止采取任何导致边界问题复杂化的举动

2024 年 3 月 15 日，针对印度已在中印边境新部署 1 万名士兵的报道，国防部发言人回应，藏南地区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方从不承认并坚决反对印方非法设立的所谓“阿鲁纳恰尔邦”。

“纪念泰戈尔访华 100 周年国际研讨会”在和平乡成功举行

2024 年 4 月 1 日至 2 日，中国驻加尔各答总领事馆和印度国际大学中国学院在和平乡印度国际大学共同举办了“纪念泰戈尔访华 100 周年国际研讨会”。印度国际大学代理副校长马利克，中国驻印度使馆临时代办马珈，中国驻加尔各答代总领事秦勇，印前联邦院议员塔伦·维杰，印退休外交官阮瑞山大使，印度国际大学中国学院院长班纳吉，印历史学家、泰戈尔传记作者达斯女士，以及尼赫鲁大学、贝拿勒斯印度教大学、阿育王大学等高校知名专家学者，印度国际大学师生等近 300 人与会。

“国际中文日”活动在印度多地举行

2024 年 4 月 19 日“国际中文日”之际，印度国际大学中国学院、恰尔肯德中央大学等校承办的“国际中文日”活动在印度多地同时举行。中国驻印度使馆临时代办马珈视频致辞，有关部门和院校负责人、印度师生和各界中文爱好者等近 300 人参加了相关活动。

马珈表示，语言是增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桥梁，通过学习对方国家的语言，中印两大古老文明互学互鉴、交相辉映。中印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大国，都在追求各自的现代化发展目标，两国合作潜力巨大，将为学习中文的朋友提供无限发展机遇。中国政府重视中印教育人文交流与合作，驻印使馆愿为印度朋友学好中文搭建更多平台、提供更多便利。

活动现场，大家唱中文歌曲、写中文毛笔字、演中文话剧、说中文绕口令、舞龙舞狮、体验剪纸等，尽享中文之美，领略中华文化独特魅力，展现印度青年学用中文的热情和中华才艺。

以崭新的历史视角推动 中印关系开启新时代

文 / 陈文玲



中印两国唯一的出路是合作，而非对抗；中印两国应该从“龙象之争”迈向“龙象共舞”。

中国和印度同为文明古国、重要邻国、最大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习近平主席也曾说：“中印用一个声音说话，全世界都会倾听；中印携手合作，全世界都会关注。”所以，我认为应该从以下三方面来看待未来的中印关系。一是中印两国应该从“龙象之争”迈向“龙象共舞”；二是“龙象共舞”何以重要；三是如何迈向“龙象共舞”，推动中印关系发展。

从“龙象之争”迈向“龙象共舞”

在有记录的历史上，大部分时间里中印两国都是世界前两大经济体，直到19世纪末才被美国超越。从3000年历史来看中印关系，中印两国都是文明古国，都具有辉煌的历史和文化，释迦摩尼创立的佛教文化，是形成中国文化的源头——儒、释、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成为大乘佛教流传至今。曾经中断的印度历史文化，在中国保

存的梵文中得以保留和修复。从300年历史来看中印关系，中印曾经都处于帝国主义践踏下的殖民地国家的苦难之中，都是上世纪民族解放运动中获得独立的国家，都是不结盟运动的倡导者，也都是当今世界大变局中的发展中国家、第三世界国家、追求和平发展与多极化世界的国家。中印两国的共同历史、共同文化、共同价值观和共同维护的多极化世界，决定了中印两国应该在重

大历史关头和创造未来历史的关键时刻求同存异,从“龙象之争”真正迈向“龙象共舞”。

然而,这些年印度一直对中国保持着毫无道理的敌意与遏制。尤其是印度政府一些政客在经济上推行“去中国化”政策,我觉得这些是不可能实现的。中印两国应该在合作中你追我赶,在竞争中迈向远方。在1960年至1990年这31年期间,印度有多达22年的人均GDP是超过中国的。到了1987年中国GDP总量已经超过了印度,但印度人均GDP还超过中国人均GDP的35%以上。从1991年开始,中国人均GDP开始反超印度,现在中国的GDP总量、中国的人均GDP已超越印度近5倍。印度朋友可以静下心来观察中国是怎么实现经济起飞的,中国政府制定了哪些使中国经济能够实现超越的、重大的宏观经济政策。这可能对印度加快发展有很大的帮助。中印两国唯一的出路是合作,而非对抗;中印两国应该从“龙象之争”迈向“龙象共舞”。

“龙象共舞”何以重要?

中印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成为世界舞台上越来越重要的国家,应成为有最大公约数、最可持续发展的建设性合作伙伴。中印两国都是人口大国,中印两个发展中人口大国在全球的地位与作用越来越重要。

如果中国经济以年均5%的



2024年2月18日,装载着集装箱的船只驶离重庆鱼嘴果园港码头。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对世界经济复苏有着巨大推动作用。(摄影/视觉重庆钟志兵)

速度增长,到2047年印度独立100年时,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将成为86万亿美元的经济体。在未来26年里,如果印度能够以6%的速度增长,届时印度将是39万亿美元的经济体,如果增速能达到8%,印度将成为64万亿美元的经济体。中印将成为世界第一大、第二大经济体,这是全球经济格局历史性、基础性重塑的标志性事件。中印两国理应抓住机遇,携手共进,相互成就。

中印在国际舞台上均为举足轻重的国家。中印两国在联合国、G20、金砖国家机制、上合组织中发挥重要作用,中印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有着相近或者相同立场,在南南合作、发展减贫、气候变化、能源安全等方面有着广泛共同利益。习近平主席

提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印度总理莫迪主张“世界一家”。在变乱交织的世界中,中印可以共同发出强劲的声音,为发展中国家争取更多制度性权利。中印能否携手合作,关乎亚洲乃至世界的未来。我们应坚持两国领导人“中印互为发展机遇、互不构成威胁”“两国是合作伙伴而非竞争对手”的重要共识。

中印两国都是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工业规模占比最高的国家。从现在到2035年,是中国制造业实现由大到强的关键时期,也是制造业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的关键时期。中国正在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现代产业体系向高质量、高效率、可持续方向发展,

为制造强国建设提供新引擎。莫迪执政以来，先后出台了三大经济倡议或战略，即2014年的“印度制造”、2020年5月的“自力更生”计划和2022年10月的“总理速度的力量”项目计划。自2014年以来，莫迪政府为“新印度”打造领导型大国战略，构建与之匹配的“领导型大国经济”。而领导型大国经济战略的主要载体，是围绕“印度制造”把印度打造成为全球性制造业大国。从印度国家发展制造业战略看，在相当长时期与中国具有互补性和差异性，与中国合作才是印度的最佳选择。

如何迈向“龙象共舞”？

面向未来，中印两国这两个亚洲巨人重新崛起，实际上是重回历史常态。中国和印度将成为21世纪不可或缺的国家，合作是两国唯一正确的选择。

注重加强中国经济与印度经济的联系，共同创造发展中国家崛起的伟大的亚洲世纪。中国取代美国成为印度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印度成为中国重要的贸易伙伴。2022年中印双边贸易额达1360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同比增长8.4%。2022年中国对印出口1185.02亿美元，同比增长超过20%；自印度进口174.83亿美元，同比下降35%，印度对华贸易逆差首次突破千亿美元大关，达到1010.19亿美元。2023财年，印度从中国进口商品增加，贸易逆差扩

大13.5%，其中中间品贸易高达90%。2023年前11个月，中印贸易规模达到1242.69亿美元，同比增长0.8%。其中印度从中国进口1072.71亿美元，同比增长0.2%。根据印度对外贸易研究所(IIFT)报告，2020年以来，除钢铁行业以外，印度所有行业自中国的进口量均实现增长。但印度是对中国发起贸易制裁最多的国家之一。在联合国的193个国家中，中国是其中128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作为两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印两国的经济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建立稳定的、长周期的、可预期的经贸关系至关重要。

应该加强两国在金砖国家机制下各类各种方式的金融合作。中国、俄罗斯、伊朗和印度等国家都在不约而同地挑战美元霸权，推动全球去美元化进程。这一趋势不仅反映了各国对美国金融霸权的反感，也揭示了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迫切需求。2023年，印度金融中心孟买两大股指的首次公开发行(IPO)数量超过了中国的三大交易所。安永(Ernst & Young)的数据显示，今年孟买国家证券交易所(NSE)和孟买证券交易所(BSE)的首次公开发行(IPO)规模有望较去年增长45%。目前影响全球资本市场，形成了所谓的“美元潮汐”，美国逐渐控制了通胀、刺激了经济，同时又收割了他国的资产。除了中国、印度这样有强大经济内循环基础的国家，鲜

有国家能够抵挡住“美元潮汐”的收割。中印两国必须加强金融合作，共同构建有利于两国和南方国家的良好国际金融市场环境和地缘关系。

两国需要在事关广大发展中国家以及全人类前途命运的全球发展与治理问题上，展开深度对话与合作。通过更加公平更加合理的全球治理秩序，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或者南方国家取得更多的发言权和合法权益。比如，中印可携手填补全球治理的严重缺位，遏制美西方动辄就将全球治理议题“泛政治化”“泛安全化”的霸权行为。在经济发展、基础设施建设、气候变化、环保、水资源利用等领域，联手向世界或者亚洲地区提供更多公共产品，共同提振国际社会特别是本地区对摆脱社会危机、经济衰退、政治动荡等的信心。

从长期看，国家实力走向将最终决定两国关系命运，印度应深度参与全球化，避免对华全面脱钩。印度对华政策需要新思维，特别是随着数字经济时代的降临，中印共同发挥两国存在的后发优势、先发优势与互补优势，这将加速重现中印两国的共同发展。📌

本文作者陈文玲为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

多极化世界中的中国和印度

文 / 叶文 (Aravind Yelery)



汲取历史经验教训，在一些具有决定意义的经济发展尝试中积累经验的做法，为替代西方主导的发展路径提供了可行方案。

目前，人们对寻找一套替代西方主导思想、物质生活和合作方式的方案已逐渐达成共识，且到了关键节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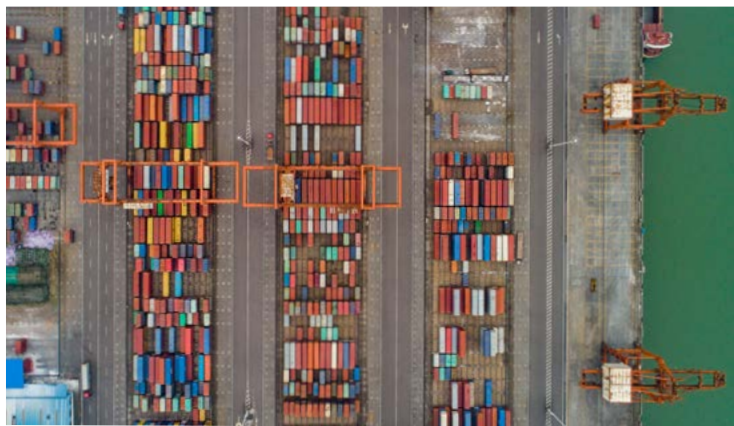
近几个世纪以来，随着经济和政治实力的不断增强，西方国家只关注于自己的利益，而无视他国利益，特别是在资源和市场等一些特定的经济利益方面，对发展中国家的现实需求选择视而不见。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已发展成为利己主义的分配体系，导致不平等的结构不断固化。西方国家在联合国和世界

银行等机构中拥有不成比例的权力和影响力，不断将发展中国家的声音和关切边缘化。

全球化利益碎片化导致了国家之间的差距愈来愈大，而未如人们所愿那样改善欠发达地区的物质条件。国际关系“非友即敌”的二元对立制造了诸多挑战。围绕影响力和战略利益的激烈竞争引发了新一轮的“殖民”浪潮。虽然“殖民化”的具体方法和形式有所改变，但将一些国家边缘化的底层思维是不变的。

寻找替代方案

考虑到西方世界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敌意，印度和中国提出了一套既不必屈从西方、又可追求自身经济发展的替代方案。两国都努力使贸易伙伴多样化，减少对任何单一市场的依赖，有效降低任何地区发展紊乱所带来的影响。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到新冠肺炎大流行，两国利用资源优势和在全球经济中的独特地位，解决了混乱所带来的各种问题。特别是，印度和中国有着庞大的国内市场和多样化的



四川首个5G智慧港口项目——宜宾港5G智慧港口一期正式上线试运行。中国作为全球南方国家的其中一员，正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将为全球南方合作共赢带来更大机遇。（C视觉）

经济模式，这与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大多数国家很相似，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增强抵御外部干扰的韧性。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印度和中国都实施了经济改革，不断提高效率、推动创新和吸引外国投资，这既加强了两国的经济基础，又提高了抵御外部干扰的能力。此外，这两个亚洲大国还着力发展国内产业，减少对进口商品的依赖。因此，经济的不断增长使两国能够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既能维护自身的战略利益，又能保持一定的灵活性，适应瞬息万变的国际局势。这使两国能够有效地应对国际舞台上的干扰和不确定性。印度在未能满足西方期待时，采取了“不结盟”外交政策来维护其国家利益；与此同时，中国倡导多边外交和区域合作对话机制，对当下西方主导的冲突解决机制产生很大影响。

中印合作有待加强

印度和中国需要为全球南方国家树榜样，即在不受西方干涉的情况下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追求本国经济发展。实现这一目标的最佳方式是加强两国在卫生、教育、数字经济、绿色能源和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合作。两国积累的发展经验和知识为其他发展中国家照亮了前行之路，并为其他全球南方国家提供了发展路线图。

例如，印度阿育吠陀和中国传统中医等丰富的医学传统在后疫情时代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两国人民不断交流传统医学知识和先进经验，增进互学互鉴。这一做法成功推动了两国相关机构开展医学研究和培训合作，共同应对传染病、妇幼保健和非传染性疾病等医疗领域面临的挑战。印度和中国还共同参与了多项全球卫生发展倡议和论坛，涉及疫情防控、

疫苗开发和发展中国家医疗保健能力建设等各个方面。

同样，印度和中国同为人口大国，拥有丰富的文化遗产和快速发展的经济，在教育领域具有巨大的合作潜力。两国在通过提高人们的劳动技能和生产力，将人力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方面积累了丰富的方法和实践经验。通过实施全面而细化的劳动力培训，可以激发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人口红利，推动经济增长，改善人民生活。印度和中国的一些机构可以向发展中国家传授这方面的发展经验。

发展中国家的绿色发展与全球可持续发展进程密切相连，是确保经济增长的同时促进环境保护、社会公平和提高经济韧性的唯一途径。印度和中国在这一领域起到了引领作用，两国的发展经验对于探寻适合发展中国家的替代方案非常重要。因此，需要创建或重组一些新的国际平台，以帮助非西方经济体更好、更公平地参与绿色发展，加强对其利益和权利的保护。例如，国际太阳能联盟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等国际平台，已成为非西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倡导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行动，呼吁在全球范围内使用可再生能源的重要平台。

发展中国家追求发展的权利本身驳斥了富裕的西方国家的很多谬论，呼吁后者在引领低碳减排和向发展中国家转让技术方面承担相应责任，以应对气

候变化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造成的不良影响。作为《巴黎协定》的缔约方，印度和中国承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因此，倘若两国在减缓气候变化方面进行战略合作，包括采用碳定价机制、森林保护和清洁技术，将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作出一定贡献。通过开展合作研究和开发项目也可以共同应对在绿色能源领域面临的挑战。

此外，发展中国家的绿色发展也将有助于解决能源危机，印度和中国在这一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能源危机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社会福祉和生态可持续性方面提出了重大挑战。富裕国家没有意识到的是，全球还有大量人口正在为获得安全可靠且负担得起的能源而挣扎，包括电力和清洁烹饪燃料。这不仅阻碍了他们的经济生产力发展，限制了教育机会，而且影响了身体健康。

因此，在环境保护和节能减排方面，需要印度和中国为全球南方国家起到模范带头作用。在发展中国家，还有很多人仍然依赖木材、木炭和粪便等传统生物燃料做饭和取暖。获取此类燃料导致了森林退化、空气污染和健康损害等不利影响。此外，还应该通过公正公平的全球治理来解决发电、输电和配电等能源基础设施不足的问题，从而大大提高这些国家的工业生产力、商业活动力和人民生活质量。

援助全球南方的中坚力量

公平、透明地获取资源和投资对于改变现有世界秩序、摆脱发展依赖至关重要。正如中国领导人在多个文献和讲话中所言，中国在海外基础设施、技术和产业方面的投资主要用于扶持当地经济发展，特别是对一些投资来源有限的地区。许多发展中国家都将中国过去几十年经济的快速发展视为模板。

印度在追求包容性增长方面的努力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案例。印度在支持全球南方国家的独立运动和去殖民化方面有着悠久的历史。作为世界上增长最快的主要经济体之一，印度被视为全球南方中的经济强国，其经济增长和发展模式主要聚焦于信息技术、医药、可再生能源等领域，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树立了榜样。

印度的文化出口，包括宝莱坞电影、音乐、瑜伽和美食，对全世界，包括全球南方国家，产生了深远影响。文化联系增强了印度与这些国家之间的亲近感和情感共鸣。印度作为南亚最大的国家之一，在地区事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南亚区域合作联盟等平台和“东向行动”政策等倡议与邻国进行互动，体现了其促进区域一体化合作的承诺和决心。

印度和中国作为两个拥有丰富资源和发展能力的主要新兴经济体，可以在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发展方面发挥关键作用。两国可

以通过捐助、优惠贷款或基础设施项目投资等途径向其他国家提供财政援助，还可以在全球发展基金和发展倡议方面作出贡献。两国在道路、桥梁、港口和能源设施等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拥有丰富的专业经验，可以为其他国家的基础设施发展提供技术和资源支持。

中印通过加强贸易往来和海外投资，可以推动很多国家的经济增长。它们可以为全球南方国家的商品和服务提供市场准入，并有益于可持续发展的领域进行投资。

印度和中国从大量具有决定意义的经济发展尝试中积累了很多经验，为其他国家提供了可行的替代发展方案。这种多层面多领域的新兴合作，源自于两国应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社会经济挑战的共同历史经历，以及在全球舞台上对促进发展、维护社会正义和公平的共同承诺。两国的相似经历和领导力，正在极大地增强这个日益紧密连接的世界中的发展、和平与正义的力量，扩大全球南方的声音，并为全人类建设一个更加公平和可持续的未来而努力。

本文作者叶文（Aravind Yelery）为印度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大学国际研究学院东亚研究中心副教授。

从淄博、哈尔滨到天水 中国文旅进入 3.0 时代

文 / 袁梦

网红城市的相继出现不仅标志着中国旅游进入了文旅产业发展的新阶段，更是进一步凸显了中国旅游市场的巨大潜力，映射出人们逐渐增强的出行意愿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彰显着中国经济发展的蓬勃动力和澎湃动能。

从淄博烧烤爆火，哈尔滨冰雪旅游兴起，到甘肃天水进入大众视野，“踏青赏花”成为文旅消费热词，近一年以来，中国旅游热门城市相继出现，各地景区相继开启“人从众”模式，假日出游人数屡创新高，中国旅游热度持续攀升。

中国文旅进入 3.0 时代

“小饼烤炉加蘸料，灵魂烧烤三件套”，滋滋冒油的烟火气，让更多人认识了山东淄博，“冰雪大世界里建起521米超级冰滑梯”“松花江上兴起热气球”，网络热点的出现展现了一个创新发挥冰雪资源优势的“尔滨”，“土豆、

手擀粉、蔬菜串成串，煮好后刷上油泼辣子”，一碗碗红彤彤香喷喷的麻辣烫让西北小城天水进入了更多人的视野……去年以来，网红城市的相继出现，让文旅产业“热辣滚烫”，也预示着文旅产业进入了3.0时代。

如果说1.0时代是以“看山看水看风景”为主的观光旅游时代，2.0时代是聚焦城市形象定位，以城市为中心展开旅游的时代，那么3.0时代则是文旅产业更加依托互联网，文旅融合更加紧密的时代。

除了接力涌现的网红城市，在旅游领域不断丰富的新样态、新模式也是文旅产业3.0时代的

显著标志。春节期间，传统庙会、主题灯会游人如织，民俗活动地点成为热门打卡地；春季来临，赏花踏青、露营郊游等具有时令特点的特色活动热度不断攀升；清明假期期间，大同、景德镇、秦皇岛、开封、泰安等小城成为热门旅游目的地，旅游目的地更加多元，小城游持续升温；假日期间，博物馆、历史文化街区迎来游玩热潮，主题游引领假期出游别样风景。

网友在社交平台上自发分享，自媒体和主流媒体陆续跟进，网络的发展和短视频的普及成为了开启文旅3.0时代的重要推手。去年冬天，作为冬季热门旅游目的地的哈尔滨，为来自全国各

地的游客提供了一系列细致周到的服务,而“冻梨摆盘”,广场上建起“温暖驿站”等暖心细节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后迅速成为刷屏的网络热梗,甚至成为了引爆哈尔滨旅游热潮的重要支点。2024年2月13日,网友“一杯凉白开”发布了一段天水麻辣烫相关视频,短时间内获得了超过百万点赞,短视频平台“甘肃麻辣烫”相关话题达到上百个,由此,天水因一碗麻辣烫成为新晋顶流。“人人都是游客,处处都是美景”,在“全民视频时代”,互联网和短视频平台的发展具有明显的用户生产内容的去中心化特征,而这些特征也在创造特色IP,发现特色资源,助力小众城市“出圈”上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网红城市的发展不仅依靠互联网,更与城市治理能力息息相关。政府部门积极处理游客投诉,爱心企业提供青年驿站半价入住等服务,当地市民自发组织车队接送外地游客……许多网红城市在走红之后,政府、企业、市民多方共同努力,通过热心周到的暖心服务留住了热度,更是留住了消费者的心。为了满足更多旅客体验淄博烧烤的需求,中国铁路济南局开行济南至淄博烧烤游周末往返专线列车;甘肃天水麦积山机场虽然只有重庆-天水-天津一条航线,但却因此把天水这个西北小城展现在了更多的游客面前,不断发展的交通和基础设施让旅游出行变得更加便利,也为文旅产业的发展保

驾护航。

网红城市的相继出现不仅标志着中国旅游进入了文旅产业发展的新阶段,更是进一步凸显了中国旅游市场的巨大潜力,映射出人们逐渐增强的出行意愿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彰显着中国经济发展的蓬勃动力和澎湃动能。

从文旅“热”到文旅“+”

无论是淄博、哈尔滨,还是近期的天水,在凭借本土特色迅速“出圈”后,都通过尽最大可能满足旅客需求,加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与市场环境等措施,接住了一波又一波的流量,“美食特色IP加上花式宠粉”似乎成为了打造现象级旅游城市的流量密码,但一个城市旅游业的长远发展需要更多的文化底蕴来依托,从今年开年以来的旅游出游趋势上可见一斑。除了新兴旅游城市外,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城市仍是出行热门目的地;春节假期期间,拥有大量历史文化资源的“山河四省”(山东、山西、河南、河北)多个热门景区热度同比增幅在全国遥遥领先;而在甘肃小城天水爆火之后,被誉为“东方艺术雕塑馆”的麦积山石窟的热度也被明显带动……网红城市始于“热梗”,更要终于文化,文旅产业发展需要更多新故事,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也是延长流量的重要支撑,只有深挖文化特色,打造更多旅游产品,不断提升服务质量,才能获得更



2023年12月16日,黑龙江哈尔滨,游客来到群力音乐长廊观赏大雪人。(IC)

长久的流量,也才能将文旅市场“开门红”变成“长红”。

从长远来看,发展文旅产业不仅能带来经济效益,更是能助力传统文化传承,推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在经济收益方面,2023年中国国内旅游收入已经恢复到2019年的86%,根据中国旅游研究院预测,2024年国内旅游收入有望超过6万亿元。作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柱产业,文旅产业也是推动产业协同发展的重要力量。近年来,随着文旅市场的不断复苏,各地精准发力,因地制宜推出文旅产品,深化“文旅+”融合发展模式,通过文旅与生态、体育、工业、农业等产业深度融合,培育文旅产业发展新业态,开发文旅消费新产品、新场景,打造特色文化品牌,不断赋能产业转型。可以预见的是,随着“银发经济”“人工智能”等热门领域的不断孵化发展,“文旅+康养”“智慧旅游”将成为新的发展趋势,届时旅游市场也将被注入新的活力。📌

中印关系在低位徘徊中 向难而行

文 / 邱昌情 陈麒羽

中印关系短期内还会呈现出在低位徘徊中艰难前行的状态，两国关系仍然充满各种不确定性，但中印友好合作的大趋势不会改变。展望未来，中印双方应扩大合作积极面，缩小消极因素，推动双边关系沿着健康、稳定和可持续的轨道向前发展，我们共同期待中印关系在未来的合作中迎来更好的明天。

2024年是印度的大选年，涉华议题无疑会成为印度大选的重要话题。在当前中印关系低位徘徊向难而行的情势下，不排除印度国内一些势力在选举前后故意挑动和渲染涉华议题，甚至在边境地区制造冲突摩擦的可能。中印关系发展新态势是国际战略环境和两国国内政治双重塑造的结果，双边关系中的合作性和竞争性同步上升，未来中印关系的回暖还取决于双方对以下现实问题的

超越。

第一，政府高层引领下达成的政治共识能否转化为政治现实。自武汉会晤以来，中印双方高层交往密切，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在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二十国集团等多边场合多次会面。中印双方达成了诸多重要的原则性共识，如双方应坚持“互为发展机遇”“互不构成威胁”“视彼此为伙伴而非对手”等。但高层会晤之后，如何将两国领导

人的政治共识转化为两国关系发展的现实，将引领中印关系的未来发展方向。

第二，将边界冲突问题置于中印关系的合适位置。边界问题一直困扰着两国关系的发展，莫迪政府打着“捍卫国家安全”的旗号，企图以边境可控的、小规模摩擦来维持或巩固其在国内的权威，大肆渲染中印边境对峙事件，挑动印度国内民族主义情绪，给中印关系转圜趋稳增加了难度。印



印度德里门。中印关系具有超越双边范畴的重要影响。中印关系重回正轨符合双方利益，也是“全球南方”国家的共同期待。（CFB）

度外长苏杰生在不久前演讲中表示，“边境状态将决定中印关系状态，只要中印持续在实控线保持对峙状态，中国就不应该指望双边关系好转”。近段时间以来，印度方面在边界问题上错误言行不断，印度在边界地区一直采取“冒进”策略，持续增加边境地区的兵力部署、强化武器装备、增加边境基础设施建设等。印度总理莫迪赴所谓“阿鲁纳恰尔邦”参加色拉隧道等项目的奠基仪式，旨在赢得更多选民支持，增加竞选筹码，印度这些举动无疑加剧了两国之间的紧张氛围，使边境问题进一步复杂化。目前，中印两军已经举行了21轮军长级会谈，双方同意通过

军事和外交渠道保持对话，但未取得实质性突破，中印双方均不太可能在领土问题上有任何让步和妥协空间。未来中印在边界问题上的拉锯还将持续，双边关系因边界问题引发小范围军事对峙和摩擦仍将可能出现。

第三，在地缘政治领域，中印两国在南亚、印度洋地区的结构性矛盾日益凸显。莫迪政府上台以来，突出了制衡中国的一面，一方面将“东向政策”升级为“东向行动政策”，以平衡、对冲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另一方面积极与美、日、澳等与中国存在强竞争关系的国家合作组建反华制华联盟，增强印度在印太地区事务的影

响力。此外，印度还有追随西方国家打“台湾牌”“南海牌”的新动向，这些对中印双边关系的冲击很大。

第四，经济“压舱石”效应应在中印关系中的作用有限。中印关系的迟迟难以转圜，给印度国内对华不友好的力量提供了打压中国在印投资、推进对华产业脱钩的借口。近年来，印度对中国在印度的正常商业活动表现出极大警惕和疑虑，动辄以“安全威胁”为由对中国企业产品下达禁令，加强了对有中资背景的企业和投资的审查，不断制造障碍削弱与中国的经贸往来，企图在经济上进一步“去中国化”，以取代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



印度维沙卡帕特南的姚明织带印度工厂，中方员工（左）在工作室和当地员工讨论生产情况。中国和印度是毗邻而居的两大发展中国家和两大新兴经济体。（CFB）

位置。

第五，多边合作成为中印关系的新增长点，但非中印关系的重点。中印在多边事务中拥有许多共同的利益和相似的立场，双方可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金砖国家、上合组织等多边框架下加强政策协调，在发展减贫、能源安全、气候变化、粮食安全、反恐、地区热点问题等议题上发挥建设性作用。中国和印度作为全球南方的重要成员和标志性力量，对于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肩负着重要责任。当前俄乌冲突、巴以冲突等热点问题频发，各方迫切需要通过对话，以和平方式解决冲突。在这一过程中，印度和中国可以发挥着建设性作用，向世界发出中印一致声音。但莫迪政府旨在成为全球南方领袖，抢

先召开“全球南方国家之声”峰会，不邀请中国参加；而中国旨在从团结发展中国家出发，希望携手中印，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发出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声音。当然，这些领域非当前中印关系最紧迫和优先事项，短期内对提升双边关系的作用有限。

第六，清除人文交流领域的负面杂音。目前中印两国民间彼此存在较大的认知鸿沟，相互交流和沟通的渠道有限。尤其是在印度民族主义高涨的背景下，印度国内排华反华气氛不断增强。在印度大选期间，印度国内媒体将可能对中印边界问题进行大肆渲染，印度对华负面舆论将比平常更甚，莫迪政府可能以更加强硬的态度获得民众选票支持，中印关系改善氛围不足。印度国内主流

媒体涉华评论和报道的主色调仍是灰暗和悲观的，仍倾向于将中国看成印度潜在的威胁，时常故意夸大、渲染中国对印度的威胁，对印度民众造成了严重误导。当前印度国内多个民调显示，印度公众对华负面认知上升，这将会限制印度政府调整对华政策的调整空间。

2024年印度大选帷幕已经正式拉开，中印关系短期内还会呈现出在低位徘徊中艰难前行的状态，两国关系仍然充满各种不确定性，但中印友好合作的大趋势不会改变。展望未来，中印双方应扩大合作积极面，缩小消极因素，推动双边关系沿着健康、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的轨道向前发展，我们共同期待中印关系在未来的合作中迎来更好的明天。☐

本文作者邱昌情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陈麒羽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学生。

中印合作具有良好基础

文 / 斯里帕娜·帕塔克 (Sriparna Pathak)

两国关系虽然复杂，但在贸易、投资和区域合作等领域也相互依赖。

尽管新现实主义范式继续主导国际关系，乃至在强权政治影响下，主权问题成为国际关系的核心焦点，但贸易和投资在稳定国际关系方面的重要作用不容忽视。中印关系就是一个典例。两国关系虽然复杂，但在贸易、投资和区域合作等领域也相互依赖。中印之间的商贸合作自 21 世纪初以来持续发展，并于 2008 年达到顶峰——彼时，中国成为印度最大的贸易伙伴。自此，中国一直是印度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

2015 年至 2021 年，中印双边贸易额增长了 75.45%。2022 财年，中印商品贸易总额同比增长 8.4%，达到 1359 亿美元，首次突破 1000 亿美元大关。印度自中国的进口额达 1185 亿美元，增长 21.7%，贸易逆差达 1010.2 亿美元。而印度对华出口额却同比下降 37.9%，降至 174.8 亿美元，低于上一年度净出口 281.4 亿美元的水平。尽管中印贸易增长强劲，但对华贸易的巨大逆差仍是印度担忧的问题——中

国是印度最大贸易逆差来源。

印度的担忧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逆差的实际规模；二是逆差逐年扩大的趋势。中国海关总署发布的数据显示，2018 年，印度对华贸易逆差达到 579 亿美元。

2019 年，这一贸易逆差小幅下降 1.78%，亦是自 2005 年以来首次出现下降，给印度带来了一丝希望。2020 年，逆差进一步下降 19.31%，降至 458.7 亿美元。全球新冠大流行导致双边贸易额下降是逆差

下降的主要原因。然而，此后印度对华贸易逆差急剧攀升，2021年达到693.8亿美元，2022年进一步扩大至1012.8亿美元，同比增长36.67%。

发挥双边投资及经济互补的潜力

尽管中印双边贸易大幅增长，但双边投资却未能紧随其后。尽管两国已成为全球受欢迎的投资目的地，但中印双边投资却不温不火。中国商务部的统计数据显示，2021年中国对印投资达28亿美元，同期印度对华投资约为1亿美元。显然，中印双边投资领域还有很大空间有待开发，对双边投资的可行性和增长缓慢的原因进行联合研究仍然是当下两国的重点任务之一。

尽管中印两国尚未充分发挥其在经济领域的合作潜力，但促进两国经济往来的一些合作机制仍然值得一提。

促进中印经济关系的合作机制

现有的中印经济关系促进机制由中印经贸联合小组牵头，两国的商务部负责推进管理。中印经贸联合小组成立于1988年，时任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访华期间，双方讨论贸易合作问题。截至目前，中印经贸联合小组已举行11次会议，最近一次会议于2018年3月在印度新德里举行。在第九次会议期间，在中印联合工作组下设

三个工作小组，包括服务贸易促进工作小组、经济与贸易规划合作小组与贸易统计分析小组。虽然这一举措值得肯定，但这三个领域还需要进一步合作。

另一个值得一提的合作机制是中印战略经济对话。该对话机制成立于2010年12月，旨在讨论宏观经济合作。该机制由印度计划委员会和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共同建立。

迄今为止，中印战略经济对话已举行六次会议，最近一次会议于2019年9月在印度新德里举行。中印战略经济对话当前由印度国家转型委员会副主席和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共同担任主席，下设政策协调、基础设施、高技术、节能环保、能源5个工作组。在第六次中印战略经济对话上，中印同意有效利用这一常设对话机制，解决悬而未决的问题和确定潜在合作领域。不过，双方尚未确定第七次中印战略经济对话何时举行。

双边合作是中印经济关系的一个重要领域，而在全球经济问题上的合作也是另一个重要方面。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印度国家转型委员会对话会就是一大典范。该对话会成立于印度总理莫迪2015年访华签署谅解备忘录后，旨在讨论全球经济合作问题。第五届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印度国家转型委员会对话会于

2019年11月28日至29日在湖北武汉举行。针对贸易领域的发展问题，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印度国家转型委员会对话会联合研究了世贸组织改革和城镇化领域，初步研究结果是第五届对话会上发布的关键成果。尽管该领域的合作以及解决全球经济问题的联合研究值得认可，但对话仍需扩大范围。

中印财金对话机制则是两国经济合作领域的另一大促进机制。该机制旨在促进中印在金融领域的合作。第九次中印财金对话上，中印双方就宏观经济形势、多边框架内政策合作、双边投资、金融合作等问题交换了意见。目前，第十次中印财金对话会尚未举行。在高度动荡的世界中，中印作为国际体系中的两个重要参与者，在探索宏观经济合作方面具有很大的潜力。

此外，中印在经济领域的其他对话机制也发挥了作用，包括中印技能发展和职业教育联合工作组、中印信息通信技术和高新技术联合工作组、中印工业园区合作联合工作组、中印区域贸易协定联合研究组和联合工作组、中印农业工作组、中印能源联合工作组以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联合研究组。然而，相关会议都是不定期召开。

拓展银行业的双边和多边合作

中印两国在银行业的合作



位于云南安宁市的云南裕能新能源电池材料有限公司。安宁工业园区是云南省重点产业园区之一，也是滇中新区的产业核心发展区。（摄影/熊瑛万旭）

也值得一提。多家印度银行曾经在中国主要城市开设分行或代表处。然而，大多数印度银行近年来都已关闭在华业务，目前只有印度国家银行和印度工业信贷投资银行在上海设有分行。印度国家银行是唯一授权在上海分行开展本币业务的印度银行。故而，如何扩展印度银行在华业务具有重要的探索意义。2011年初，中国工商银行获准在印度开展业务，并于当年9月在孟买设立了分行。

中国工商银行也曾申请在新德里设立第二家分行，但由于条件限制，至今尚未开业。在遵守当地规则的基础上扩大银行业务的探索有助于开辟中印在银行领域的广阔合作前景。

中印两国还在多边开发银行领域进行合作，其中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及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就是不容忽视的力量。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印度是第二大股东，持股比例达8%左右，并在董事会占有一席之地。印度还是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的最大借款国。截至2022年8月31日，印度已获批19个项目，获得承诺贷款69.2亿美元。倘若中印能融合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中的合作机制与中印联合工作组的运作机制，将促进两国之间的相互理解与合作。

探索石油行业合作

在中印经济合作方面，石油领域尤为突出。中印正利用两国庞大的市场规模在石油领域进行合作。印度石油部长于2018年10月到访北京，随后中国国家能源局副局长于2019年访问新德里。鉴于2024年原油波动仍将持续，作为石油进口大国，中印在石油领域的合作值得探索。

在上海合作组织支持下，中印能源合作大有作为。近年来，鉴于中印人口不断增长，需要不间断地获取能源以实现经济持续增长，中亚已成为两国的另一大能源来源。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总计占有世界约25%的石油储量、50%以上的天然气储量和35%的煤炭储量。土库曼斯坦和哈萨克斯坦等国发现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正在为中亚石油和天然气市场创造丰厚的利润。

在金砖合作机制下，中印两国能源领域的进一步合作亦是大有可为。2022年，首届金砖国家能源合作论坛在北京举行。虽然这是一个不错的开端，但中印之间需要就各种形式的能源合作展开进一步讨论。

为了扩大中印经济合作，我们需要利用现有的联合工作组和对话机制，推动未来的合作取得更多成果。

本文作者斯里帕娜·帕塔克（Sriparna Pathak）是印度金达尔全球大学助理教授，致力于研究中印关系。

从印度大选看印度教民族主义

文 / 张家栋

印度教民族主义对中印关系的影响是多元复杂的。印度教民族主义上升趋势对印度对外政策和对华政策的影响，也是复杂的，有些影响之间甚至是相互矛盾的。



象岛上的一群孩子。象岛位于印度孟买市区东南6公里处，岛上还有公元7世纪兴建的供奉印度教湿婆神的石窟庙宇。(CFB)

2024年印度大选已经于4月19日正式开始。这次大选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持续上升，以及世俗主义观念的继续衰落。在所有的参选印度政党中，只有印度共产党敢于公开打出世俗主义大旗。其他政党，要么如印度人民党（简称印人党）那样公开倡导印度教民族主义，要么就像印度国民大会党（简称国大党）那样，通过提倡政治包容来暗藏自己的世俗主义理念。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崛起对印度内政和外交都有深刻影响。支持者声称，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兴起，

可以帮助印度实现国族建构,解决长期以来拖累印度发展的社会多元化和政治碎片化问题。反对者则声称,这将破坏印度的多元社会现实,损害印度民主政治的世俗主义基础,并可能导致国内外矛盾与冲突。

在过去十年,中印关系经历了从迅速发展到急剧恶化的变化。这也是在印度教民族主义高涨的背景之下发生的,但核心变量是中印同时崛起引发的战略不适应症。目前,国际学术界对印度教民族主义的认识存在差异显著的,甚至是相互对立的观点,对准确全面地认识印度教民族主义,预测印度的发展趋势不利。分析印度教民族主义,要有历史、多元、关联、动态和开放五种视角。

一是历史视角。“印度教”

(Hinduism) 是 19 世纪英国殖民者创造的一个英语新词,其内涵一直在发展演变。在古代的吠陀教和婆罗门教时期,印度教的前身其实是一个婆罗门祭司们控制的宗教。在沙门时期,随着佛教和耆那教等宗教的产生,印度教的领导阶段逐渐从婆罗门祭司扩大到国王、武士等高种姓群体。到公元 8-9 世纪,传统的印度教思想得到了世俗化、生活化改革,提倡简化宗教仪式,主张男女平等,反对种姓制度,并提升寺庙在宗教活动中的重要性。这些改革都扩大了印度教的信众基础。

从公元 8-9 世纪新印度教的形成,再到 20 世纪初期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兴起,印度教先后

沿着世俗化、生活化和民族化的方向发展。到印度民族独立运动时期,印度教思想是印度本土文化的核心元素,为印度独立运动提供了思想基础。要突出印度本土文化特征,就绕不开印度教这个文化标签。在这个意义上,尼赫鲁和甘地其实也算是广义的印度教民族主义者。当然,他们属于其中比较温和、开明和包容的派系。

从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开始,印度教民族主义政党的代表印人党开始上台执政。这既是印度教民族主义思想的胜利,也是对其自身的一种改造。印度教民族主义也如世界上的很多思潮一样,在野时要以激进言论获得执政机会,但执政后要走相对温和、包容的路线,以实现更广泛的政治目标。在 21 世纪,印度教民族主义更多地被视为一种民族主义思想,宗教特征被显著削弱。

二是多元视角。多元与碎片是印度社会和政治的主要特征。印度教本身就很难定义,是对古印度六派哲学流传到今天所产生的各种信仰体系的总称,是“囊括各种不同的知识或是价值观的复杂宗教,而不是一个刚性的、共同的单一宗教”。印度教民族主义这个概念也一样,是多元复杂的,是一个集体名词,在不同的人心中有不同镜像。反对者认为这是一种法西斯主义,支持者认为这可以为印度提供一个跨越宗教、种姓、区域、语言和民族的新国家认同。

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核心是印

度教特性 (Hindutva)。这个概念于 1920 年代由“印度教大斋会”领导人 V.D. 萨瓦卡 (Savarkar) 提出。尽管萨瓦卡认为印度教应该在印度建立霸权地位,印度应该是一个印度教国家,但他更多是从民族而非宗教的视角来定义印度教特性。宗教只是印度教特性的一个组成部分。印度教徒 (Hindus) 更多地被视为一个民族文化群体。

对印度教民族主义的不同预期,牵引着印度政治家需要在不同场合迎合不同的群体。2024 年 1 月 22 日,莫迪出席北方邦阿约迪亚罗摩神庙的落成典礼。这既是在打宗教牌,也是在打民族牌。在很多印度人看来,重建罗摩神庙是印度摆脱殖民主义统治、重现印度荣光的一个象征。随后,1 月 30 日,莫迪在圣雄甘地的遇难日向甘地致敬。而人们一般认为,甘地死于极端印度教民族主义分子之手。3 月 12 日,莫迪又在古吉拉特邦首府艾阿迈达巴德出席甘地道场 (Sabarmati Ashram) 的重修仪式。很明显,莫迪努力在宗教与民族、排他与包容、极端与温和之间保持平衡。他的言行本身就是印度多元碎片社会文化特征的政治映像。

三是关联视角。西方有一句谚语,“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政教分立是人们对政治现代化的首要判断标准。但是,政教分立只是政治现代化的一个原则,本身并不能被绝对化。事



湿婆之舞。这种宇宙之舞的姿势暗含了湿婆的五个神性：创造、保护、毁灭、消除无知与束缚及使灵魂获得解脱。(CFB)

实上，西方国家也做不到绝对的政教分立，而是体现出“政教分立、相互制衡”的复杂关系。现代文明都是从古代文明传承而来，古代文明的核心往往就是宗教思想。古代与现代、宗教与政治之间的联系，不是说切断就能切断的。事实上，基督新教信仰与美英政治制度之间并无冲突，反而是其基础之一。印度教民族主义与世俗民族主义或世俗主义之间的关系，也不是相互隔离的，更不一定是相互对立的。两者在外在表现上有差异，但是也有其内在的思想一致性。

印度教民族主义本身就是印度独立运动的核心思想，是印度自我再发现的产物，本身就包含宗教与世俗、激进与温和、保守与进步等不同思想。尼赫鲁、甘地和帕特尔，代表着其中的不同派系。他们的思想内核之间，是基

于印度本土文化特征的内部一致性，只是在外在表现上有差异。因此，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兴起，本身虽然有印度宗教化的显著特征，但这一过程也伴随着印度教的民族化和大众化。

四是动态视角。印度教民族主义在不断演变。即使从过去十年来看，印度教民族主义运动的思维与实践也有明显的变化。从形态上来看，2014年以来，随着印人党的上台，印度教民族主义从民间来到庙堂，从政治边缘走向政治中心，从一个自下而上的社会运动转变为上下联动的政治运动。极端印度教民族主义者追求的是“四个一”，即一个国家（印度）、一个宗教（印度教）、一个民族（信仰印度教的民族）和一种语言（印地语）。但是，这并不是印人党政府政策全部的主张。莫迪主打的几张牌，多数不是印

度教民族主义导向的。首先是福利牌，印度政府向底层民众增加福利支出，受益群体主要是印度教群体中的低种姓，以及其他宗教群体，尤其是处于社会底层的穆斯林群体。其次是行政牌。印度中央政府利用数字金融手段，尽量绕开地方政府和地方政党，直接接触民众和基层自治机构。这既让印人党政府将地方政党和地方政府边缘化，又争取很多民众的支持。事实上，这本来是前国大党政府的主张。但前国大党政府受制于执政联盟中地方政党的牵制，无法有效地落实。再次，宗教目标与民族目标混同牌。在这次大选中，印人党打出了宗教牌，如建罗摩神庙。但是，印人党和印度民众中的很多人，并不把罗摩神庙建设简单理解为一个宗教举动，更多是从民族情感的角度来看这一问题，认为这一举动有助于洗刷漫长的殖民主义历史。最后是反种姓牌。印度的种姓体系是非常复杂多元的体系。现在，印度种姓制度的形态更加复杂，出现阶级化趋势。一些传统的低种姓群体已经通过个人努力、选举政治或政策优待，晋阶社会上层。传统的种姓划分，其实是英国殖民者把印度多元复杂现实进行简单化、抽象化理解的产物，与现实政治和社会活动状况并不完全吻合。在2024年大选中，印人党的主要竞选纲领是发展与进步，主要的政治目标则是“一个国家，一个选举”。印人党试图基于更强的执政地位，用政

治手段来促进印度国家政治与地方政治生活的一体化，并试图用政治手段去助推经济发展目标。

国大党也没有突出宗教议题，主打民主和宪政议题。

五是开放视角。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未来并不确定，未必会走到很多人担心的程度。很多人担心，印度教民族主义的上升，是否会导致印度内部矛盾激化和分裂，是否会走向对外扩张的道

印度也缺少对外扩张的经济和科技力量。历史上那些对外扩张的国家，无一不是在经济和科技领域领先的国家。印度目前仍然处于外交服务于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仍然处于上升发展期，而不是内外矛盾激化期。

从现实中来看，印度教民族主义以及印人党虽然在印度占据主导地位，但并不具备垄断优势。印度的政党政治、区域差异和宗

互矛盾的。一方面，印度教民族主义的上升叠加印度经济的快速发展，正推动印度对外政策更加咄咄逼人。从双边关系的视角来看，这导致中印之间的对抗性上升，边境争端等历史恩怨更难解决。但是，印度对外政策，是基于权谋而不是基于力量的，并不具有稳定性和真正的独立性。印度外长苏杰生就曾在国际会议上，在回答印度如何利用俄乌冲突从俄罗斯获得实利时称，那是因为印度外交很聪明。

另一方面，印度教民族主义上升趋势又会增强印度的战略自信和战略自主，会对冲美西方拉拢印度以制衡中国的努力。在俄乌冲突问题上，印度一直不愿意被美西方拉拢，不愿意站队乌克兰。这一战略自主特征表现得非常明显。在全球层次，这一趋势其实符合国际格局多极化的形成，也能减少中国对印度与美西方形成反华战略同盟的忧虑。另外，印度教民族主义的上升，也会削弱印度与邻国和中东国家之间的关系，这其实会损害印度崛起所需要的周边环境。📌

“在过去十年，中印关系经历了从迅速发展到急剧恶化的变化。这也是在印度教民族主义高涨的背景之下发生的，但核心变量是中印同时崛起引发的战略不适应症”。

路？这个担忧早就有了。当年尼赫鲁曾承诺印度将是一个和平的、多宗教的国家。穆斯林联盟领导人真纳则表示怀疑，所以要求印巴分治。随着印度教民族主义的逐渐上升，“尼赫鲁的承诺”和“真纳的质疑”，哪个将是正确的？这些担忧不是空穴来风，但概率非常低。一方面，印度是一个缺少国家认同的国家，多元碎片是其基本特征。印度教也不是一个西方意义上的宗教，而是一个多元复杂的宗教、社会、文化元素共同体。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核心使命，是形成国家认同，尚处于民族主义的初级阶段。另一方面，

教文化差异仍然存在。更重要的是，印度教民族主义在塑造印度的同时，本身也在不断地被塑造。现在有很多低种姓和穆斯林民众也在支持印人党，这说明印人党在变化。另外，也有很多印度教宗教人士，在积极地反对印度教民族主义运动。印人党及其领导的政党联盟，在2024年的民调结果与2019年相似，目前还没有呈现出压倒性的领先优势。

最后，印度教民族主义对中印关系的影响是多元复杂的。印度教民族主义上升趋势对印度对外政策和对华政策的影响，也是复杂的，有些影响之间甚至是相

本文作者张家栋为复旦大学南亚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大选后的中印关系或将呈现波浪式发展态势

文 / 胡志勇

中国从来没有把印度作为竞争对手，一直希望两国成为好邻居、好伙伴，共同在全球南方国家合作中发挥积极作用。健康稳定的中印关系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有利于本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印度大选自4月19日正式启幕，近10亿选民将选出议会下院（人民院）议员，规模举世罕见。现任总理莫迪所在的印度人民党（简称印人党）有望在大选中获胜，莫迪将开启第三个任期。

值得关注的是，莫迪在大选前接受美国《新闻周刊》采访时的一番言论被认为是对华立场的罕见软化。他表示，中印关系意义重大，中印边境问

题应当尽早解决，从而把双方互动中的“不正常现象”抛在身后。然而，无论莫迪说了什么，关键还是要看大选后印度新一届政府的实际行动。

影响对华政策的内因与外因

在中国对印政策未发生显著变化的前提下，我们可以从内因和外因两部分研判印度大选后新政府对华策略的变化趋势。

内部因素方面，可归为“印

度教民族主义崛起”“意图经济超车”等。近年来莫迪积极以“印度教民族主义”将印人党塑造为“印度教国家的守护者”，并争取到了近10亿印度教徒的狂热支持。若印人党胜选，印度的政治力量架构与政治话语体系将进一步巩固以印人党为中心的格局，在进一步推动印度教民族主义日渐成为印度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同时，也将在印度国内埋下各教

派纷争的种子。印度政府或将通过全方位对华、对巴基斯坦示强转移社会视线，缓解国内压力。

莫迪的第二任期以来，印度政府经济议程持续推进乏力。然而，在印度经济处于低迷的同时，中资制造业企业、互联网企业、工程承包企业、进出口企业加速进军印度市场。截至2020年底，中国企业在印度注册公司数已达6000余家，在印累计投资超过31.83亿美元。此种对比反差越鲜明，印度国内各利益相关方对华警惕越上升。莫迪在新的任期内仍可能继续实行经济保守主义；发展“印度制造”，意图取代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位置；淡化对华经贸合作，呼应美国提出的对华“脱钩”“断链”战略。

外部因素方面，可归为“美国战略呼应”“区域权力政治争夺”等，美国往往被视为影响印度对华政策的关键。美西方反华、制华需求的不断增强及中美战略竞争的激化，客观上将印度的地缘战略价值拉高至印度建国以来的峰值，这是印度政府对华示强的最大底气。

美国视“印太战略”为针对中国崛起的牵制战略，而夹在其间的印度也视参与美国倡导下的“印太战略”为其大国崛起的重要路径。出于政治、军事、经济三方面的综合考虑，印度主动呼应并积极参与美国

主导的“印太战略”体系，在提升本国军事实力的同时应对中国崛起带来的压力。可以预见，印度将进一步强化其在四方安全机制中的作用，希望通过“印太战略”提供的经济、金融合作机制的支撑来抗衡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

另一外部因素是地区主导权之争。莫迪上台后，将“邻国优先”（Neighbour First）作为印度外交政策的基石，长期以来将南亚地区视为其传统势力范围，而中国在南亚地区影响力的上升被视为对印度主导权的威胁。随着越来越多的周边国家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中印在南亚及北印度洋地区渐渐陷入越来越尖锐的地区秩序之争。印度新政府对华、对南亚政策的核心动因，在于确保印度的地区秩序主导权不受中国影响力的侵蚀。

边界问题不是中印关系的全部

日前印度外长苏杰生在新加坡的一次公开讲座中再次就中印边界争议问题表态，他强调只有解决边界争端，两国关系才有望发展。诚然，边界问题始终是中印之间的棘手难题，严重影响了两国关系的发展。然而边界争议从属于双边安全关系，并且是其中的一个小部分，不能以偏概全，更不能以边界问题绑架双边关系，这既非理性之举，也无助于双

边关系的实质性改善。将边界问题凌驾于双边关系之上，根本无助于争端的解决，恰恰反映出了印度的战略短视行为。

中国从来没有把印度作为竞争对手，一直希望两国成为好邻居、好伙伴，共同在全球南方国家合作中发挥积极作用。健康稳定的中印关系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有利于本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边界问题不是中印关系的全部，应当将其放在中印关系适当位置加以妥善管控，保持中印关系的可控性，推动双边关系稳定健康发展。

综上，莫迪领导的印人党获胜后，中印关系可能仍呈现起伏不定的波浪式发展态势。在大选完成后，印度新一届政府若能与中国相向而行，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把握双边关系，加强政治互信，坚持对话合作，妥善处理分歧，则能真正有效推动双边关系沿着健康稳定轨道向前发展。■

本文作者胡志勇为上海社科院研究员、云南省社科院特聘研究员。

印度大选之后的 中印关系前瞻

文 / 王世达

无论谁当选总理，印度大概率不会改变当前的对华政策取向，这从根本上取决于印度“有声有色的大国梦”、中印互为毗邻大国以及存在边界等争议问题的地缘政治现实。



印度加尔各答的一个十字路口。印度多项民调显示，莫迪的个人吸引力大于印人党的吸引力。(CFB)

众所周知，印度于4月举行新一轮大选，各方整体看好现总理莫迪带领印度人民党（简称印人党）二度连任前景。毫无疑问，印度大选及新政府政策走向势必对中印关系产生影响，对此中国有必要进行理性看待。

印度各方普遍看好莫迪的连任前景

莫迪连任前景看好源于多重因素。最重要的原因是莫迪的个人魅力无出其右。印度多

项民调显示，莫迪的个人吸引力大于印人党的吸引力。例如，在2019年大选中，近三分之一投票给印人党的选民表示，若莫迪不是总理候选人，则未必投票给印人党。

近年来，莫迪将自己和印人党塑造为“印度教民族主义、印度教、印度教徒的代言

相比之下，国大党领导层无力与莫迪的超强个人魅力相抗衡。印度有专家表示，若国大党想扭转颓势，就必须调整领导层，让年轻面孔走上前台。在反对党联盟方面，尽管国大党、草根国大党等主要反对党2023年建立了名为“印度国家发展包容性同盟”（INDIA）

中仅占1613个，在31个邦或者联邦属地中仅在10个执政。此外，联盟内部还存在不团结问题，进一步削弱自身实力。

印度有望在2030年前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

众所周知，中国和巴基斯坦始终是历次印度大选都绕不开的话题，朝野各党选举前和竞选期间都在对中国和巴基斯坦政策，尤其是边界争议问题上表态强硬，以显示自己是“印度国家利益的捍卫者”，否则就会被抹黑为“向外部势力妥协、投降”。

印度大选启幕以来，无论印人党还是反对党都在利用中印关系谋取自身政治收益。例如，国大党领袖拉胡尔·甘地2月底在北方邦阿里格尔指责“中国商品涌入严重冲击印度本土小型手工业”。拉胡尔称，北方邦阿里格尔是著名锁具制造城，但大型商业集团大量进口中国廉价商品，严重冲击当地小型家庭作坊，希望未来能看到“阿里格尔制造”的电子产品，而非“中国制造”。

无论谁当选总理，印度大概率不会改变当前的对华政策取向，这从根本上取决于印度“有声有色的大国梦”、中印互为毗邻大国以及存在边界等争议问题的地缘政治现实。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处于变化之中。历来

“印度希望以此从美国等西方世界获得资金和技术加速发展，成为世界排名前列的经济大国，实现‘有声有色的大国梦’，特别是吸引美国和西方世界的产业从中国向印度转移，帮助印度发展本土制造业、提高其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的权重，并逐步降低对华的产业依赖，甚至取代中国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地位。”

人”“印度的守护者”，并将其上升为政治正确，把反对党抹黑为“反对印度教，反对印度教徒”。此举极大迎合了印度教民族主义高涨的国内形势，塑造了莫迪和印人党的政治正确叙事，争取到占总人口八成左右的印度教徒支持。主要反对党国民大会党（简称国大党）对此难以破局，屡屡被印人党打压而被动应对。

的联盟，吸纳了28个政党，有意合力阻止印人党连任。然而，反对党联盟前景并不乐观。INDIA联盟在2023年底地方邦议会选举中遇挫，丢掉了此前国大党执政的拉贾斯坦邦和切蒂斯格尔邦。截至今年1月，该联盟所有28个党在人民院543个席位中仅占119个，在联邦院245个席位中仅占91个，在邦议会全部4036席位



印度是世界第二大茶叶生产国。印度国家银行预测，印度 2030 年将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CFB)

有大国雄心的印度认为自己大有可为，更希望大有作为。印度国家银行预测，印度有望 2027 年超过德国，2029 年超过日本，在 2030 年之前成为“世界前三经济体”。印度敢做出这种预测的一部分“底气”，源于美国的“拉印制华”策略。美国对印度大加吹捧，鼓励印度成为安全、发展等领域的“净提供者”。在这一背景下，印度对于当前国际格局，尤其是中美印关系的认知已经相对成型。具体说来，印度认为，美国出台“印太战略”虽然意在打压中国，但客观上将印度洋与西太平洋连为一体，这便于印度在更广阔的战略空间发挥影响，因此符合印度的战略利益。

印度认为，在美国“印太

战略”框架下，印度明显处于更为有利的国际位置，可以更便利地调动大国博弈，增强印度战略权重，获得更多实际好处。例如，在经济领域，针对美国针对中国的“脱钩断链”做法，印度认为这是难得的机会。印度希望以此从美国等西方世界获得资金和技术加速发展，成为世界排名前列的经济大国，实现“有声有色的大国梦”，特别是吸引美国和西方世界的产业从中国向印度转移，帮助印度发展本土制造业、提高其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的权重，并逐步降低对华的产业依赖，甚至取代中国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地位。可以说，无论从战略上，还是经济上，印度都没有足够动力改变目前的中印关系格局。

中印合作空间始终存在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中印关系就前景灰暗。中印仍有可能在共同感兴趣、存在共同利益的领域展开互利合作，包括气候变化、推动国际金融体系进一步改革等。为此，中印可以探讨重启中印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高级别经贸对话机制等核心沟通平台和机制，强化“中印是搬不走的邻居，两国实现发展都需要良好的外部环境”认知，凝聚“中印互为发展机遇、互不构成威胁”“两国是合作伙伴而非竞争对手”重要共识，强调“中印作为邻国存在一些分歧是正常的，但这不是两国关系的全部，也不应以分歧定义中印关系”，以开放包容的态度推进互利合作和人文交流。

无论大选结果如何，我们对于中印关系的前瞻都应该保持理性和客观，与此同时要不断拓展中印合作的空间和可能。

本文作者王世达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南亚所副所长。



龙象共舞 相互成就

China and India Work Together
for Common Development



印度大选即将揭晓， 印人党或将连任？

文 / 李涛 邓桢蕾

尽管印度对华强硬的态度在短期内很难有所改善，但总体来说，印度人民党改变了上届选举将中国视为“威胁”的说法，一定程度上预示着中印关系有新的发展空间和契机。

印度新一届人民院选举于2024年4月19日开始举行，该院拥有543个席位，赢得多数席位的政党或政党联盟将提名总理候选人并组建执政政府。为了提高支持率，以国大党为代表的反对派与印度共产党、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以及众多地区政党组成了印度国家发展包容联盟（Indian National Developmental Inclusive Alliance，简称INDIA）。以印度人民党（简称印人党）为代表

的执政党继续以民族民主联盟（National Democratic Alliance，简称NDA）的身份参加竞选。根据最近的民意调查，印人党政府仍遥遥领先，42%的受访者对莫迪政府非常满意，62%的受访者希望莫迪再次担任总理。同时，在2023年12月进行的四个邦选举中，印人党获得其中三个“印度语选区”关键邦的胜利，进一步巩固了选前地位。因此，莫迪领导的印度人民党政府有望在2024

年大选中继续连任。

印人党的优势

执政党与反对党实力差距明显。以印人党为代表的执政党联盟和以国大党为代表的反对党联盟实力差距较大。就联盟本身而言，反对党组成的印度国家发展包容联盟尚未形成反印度人民党合力，联盟内部在席位分配、种姓普查等事务上还存在分歧，也尚未制定出抗衡印度人民党的“意识形态替代方案”。而执

政党联盟经历了两个任期的考验,已具备较为完善的联盟运行机制和规则。就支持率而言,根据印度ABP新闻社和选举研究投票意见中心(CVoter)2024年4月最新发布的联合调查显示,58%的参与者支持莫迪成为下一任总理,国大党的支持率位居第二,仅为16%。

在选举活动中印人党作为执政党的优势表现突出。在应对反对党方面,印人党在舆论、经济和人员上掌握着主动权。2023年12月,印度税务部门在国大党议员迪拉杰·萨胡的多处住所搜到多达35亿来源不明的卢比现金,印人党领导人借此抨击国大党的腐败。2024年3月,印度所得税部以国大党未能提交2017-18年以来收到的现金捐赠的所得税申报表为由,向国大党追回近350亿卢比的税款。不仅如此,印人党还从人员上削弱国大党。印度媒体《The Wire》最近发表报告称,印度各邦至少有12名反对派领导人在过去几个月面临刑事指控的情况下加入了印人党。在提高支持率方面,印人党通过与衰弱的地方政党结盟获得政治基础。在泰米尔纳德邦,印人党与该邦的地方性政党Pattali Makkal Katchi (PMK) 结成联盟,以在人民院选举中应对该邦的主流政党——达罗毗荼进步联盟(DMK)和印安纳达罗毗荼进步联盟(AIADMK)。尽管印人党的做法可能并不会帮它赢得



孟买街头走过的一家人。印度新一届人民院选举于2024年4月19日开始举行,该院拥有543个席位,赢得多数席位的政党或政党联盟将提名总理候选人并组建执政政府。(CFB)

席位,但其得票率会因此上升,而印人党在两个主要南部邦的影响力也将因此得到提升。

曲折发展的双边关系

在2024年印度大选开展初期,总理莫迪宣布了其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的目标——“Abki baar 400 paar”——即全国民主联盟将在人民院中突破400个席位大关,印人党将赢得其中的370个席位。基于此前分析,印度人民党不仅很有可能获得选举的胜利,还可能获得“大胜”,而“大胜”就意味着印人党对国家的控制更加强硬,其民族主义议程也将持续推进,而中印关系的复杂化、紧张化也将持续下去。

根据清华大学发布的《中

国与大国关系分值表(1950-2023年1月)》可明显观察到,自莫迪政府2014年上台以来,中印关系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在莫迪政府上任初期,中印关系稳步提升,年度平均分值从2013年的5.08上涨至2016年的5.79,最高升至5.9,几乎是195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二是2017年洞朗对峙事件发生后,两国关系断崖式下降,但在两国有意维护中印关系的努力下,略有回升。三是2020年加勒万河谷冲突事件发生后,两国关系进一步下跌,几乎达到近20年来的最低点。可以看出,莫迪政府对华政策呈现出阶段性特点,尤其在2017年之后产生较大变化。

战略合作——中印关系快

速升温。在第一阶段，莫迪政府对华采取“战略合作”态度，中国既是其经济发展的重要机遇，也是帮助其在国际上提升话语权、提高影响力的主要方式。这一时期，莫迪政府将对华合作的重点放在经济上，双边贸易连年突破新高，双方企业交流频繁，在“印度制造”和“数字印度”等倡议的支持下，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开始拓展印度市场。不仅如此，两国高层更是互动频繁。然而，在中印关系升温的同时，印度还对华采用“问题外交”，2016年年初到2017年年中，莫迪政府相继在中印边界、涉藏、涉台、未能加入核供应国集团(NSG)等问题上提出不合理的要求或指责中国。

战略平衡——中印关系有限回暖。2017年洞朗对峙事件发生后，印度面临的国际环境并不友好。一方面，印日关系的深化招致俄罗斯的不满，另一方面，2017年美国特朗普上台后大力奉行“美国优先”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极大冲击了美印关系。基于此，虽然洞朗危机发生后，中印关系直线触底，但印度也担忧自己在国际上处于“孤立”状态，不得不通过各种渠道与中国缓和关系。首先，两国高层交流逐渐恢复。在2018年一年内两国领导人举行了4次会晤，其中2018年4月的武汉非正式会晤是两国关系重回正轨的催化剂。其次，在经贸上，两国双边贸易额突破新高，达到近

900亿美元。最后，印度在安全上充分考虑中国的顾虑。在美国提出“印太战略”以制衡中国的背景下，印度对此作出了较为平衡的策略，向中方作出了保证。然而尽管这一时期印度对华态度缓和，但仍比较有限。在边界问题上，印宣称不会因武汉会晤和关系缓和而降低在边界地区“防卫态势”，继续开展逼进式边界巡逻活动。同时，印度也不断加深与美国的战略防务关系，并不断加强在印度洋沿岸投棋布子，试图牵制中国。

战略竞争——中印关系持续走低。2019年印度人民党以绝对优势成功连任，政府内阁成为了名副其实的“莫迪内阁”，印度的大国雄心更加显露。新冠疫情的暴发加速了印度对华政策的调整，无论是在外交上还是在经济、军事上，印度开始向美国靠拢。在2020年6月加勒万河谷冲突事件发生后，印度更是直接将中印两国推向“对抗脱钩”阶段，政治互信继续丧失。两国高层交往几乎停滞，民间交流更是受限，虽然中印贸易额屡创新高，但莫迪政府坚持对华“脱钩”，限制对华贸易和中资企业在印发展，禁止中国应用软件的使用。印度外长苏杰生在2020年9月出版的《印度的方式：不确定世界下的战略》(The India Way: Strategies for an Uncertain World)将中国定位为“麻烦制造者”，需要管理。这一时期，莫迪政府在经济、



中印舞蹈艺术家在第三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印度国家馆日的活动中表演印度舞蹈。(CFB)

政治、意识形态和安全领域发动全面的对华竞争，“借力”中美战略竞争，实现自己的大国理想。

中印关系的前景

如果莫迪连任成功，执政党将保持政策的延续性。一方面，中印边界问题不易解决，加上中美博弈给印度带来了战略机遇期，其能够从中获利；另一方面，莫迪表示要在未来5年让印度跃升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说明印度的发展需要安全、稳定的周边环境，因此，维持对华关系的适度紧张对印度有利。若莫迪政府继续连任，或将继续延续此前对华的强硬外交政策，在边界问题上保持战略克制且不让步的态度，借此奠定中印关系的基调。

首先，边界问题或将成为莫迪下一任期的重点事项。莫迪今年4月10日接受美国《新闻周刊》专访时罕见地对中印关系进行表态称，“中印需尽快解决边境旷日持久僵持，摆脱双边互动中的不正常现象”。过去4年，中印关系低迷不振，莫迪一直避免在议会等公开场合谈及双边关系，但如今却主动重提中印关系。此举或是在大选前再次利用“中国牌”提高支持率，也是向中国、美国以及全世界发出了一个明确且重要的信号，表明如果莫迪顺利竞选并连任总理，他将集中精力解决两国关系问题。同时，在2024年竞选宣言中，印人党也承诺加快与中国、缅甸和巴基斯坦边境的基础设施建设，并计划

将在围栏部分引入技术解决方案，使边界线围栏变得更加智能。此举可能让中印在边境地区的矛盾变得更加复杂。

其次，经济方面，印人党政府大概率将延续当前的对华经济政策，中印经济结构性竞争将加大。印人党承诺印度将在未来五年，直至2029年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并将在交通、制药甚至太空等诸多领域加大发展。未来五年印度的外国投资有望继续增加，印度有望成为新的全球市场。过去一年，印度继续打压中国在印企业和人员，试图实现中国企业的“印度化”，要求中国在印企业增加印度资本和印方管理人员，明显突破正常政企业界线。莫迪连任将使经济民族主义成为印度经济政策的主导方向，伴随着持续性低迷的中印关系，印人党对华经济政策将继续推进“脱钩政策”，减少对中国的依赖性，重塑其与世界其他国家产业链的关系。

最后，外交方面，新政府或将为中印关系带来新的发展空间，虽然空间十分有限。在2024年竞选宣言中，印人党外交政策的重点包含了做好南方国家的“代言人”、强调邻国政策、注重印度洋地区的安全与发展、打击恐怖主义、加入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扩大印度在全球的外交影响力。但值得注意的是，与2019年的宣言不同，其中没有提及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孟加拉湾多部门技术经济合作

倡议或东南亚国家联盟，也没有直接提及巴基斯坦或中国作为印度的主要安全威胁，而是将重点放在恐怖主义和左翼极端主义等非传统安全威胁上。虽然提到需要加强边境基础设施，但也没有直接提及中国。这些变化可能意味着莫迪政府的对华外交政策将更加谨慎。尽管印度对华强硬的态度在短期内很难有所改善，但总体来说，印度人民党改变了上届选举将中国视为“威胁”的说法，一定程度上预示着中印关系有新的发展空间和契机。总的来说，中印原有问题尚未解决，两国关系缺乏面对新问题的韧度，在印度国内民族主义盛行的背景下，印人党也只能采用实用主义做法，“借力”其他域外国家与中国进行抗衡，这将导致中印关系受多重因素的影响，复杂性和多边性显著上升。^[6]

本文作者李涛为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教授，作者邓桢蕾为四川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

职教搭桥，沟通民心

——印度鲁班工坊的故事

文 / 李云梅 王丹阳

分享中国职业教育模式，共育技术技能人才，印度鲁班工坊在印度落地生根，蓬勃发展，搭建了中印两国人文沟通的桥梁。

中国春秋时期的工匠鲁班因精湛工艺闻名于世。今天，中国职业教育品牌鲁班工坊承载了新时代的中国工匠精神。目前，鲁班工坊已经在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开设在印度的鲁班工坊，以分享中国职业教育模式、共育技术技能人才为立足点，成为中印两国在职业教育领域合作的新名片，同时也为推动中印交流合作作出了巨大贡献。

校企双元，打造产教融合国际化新引擎

印度鲁班工坊于2017年12月8日正式揭牌启运，是中国在海外建设的第三个鲁班工坊。前期经过合作院校遴选、确定合作专业、建设地点、签订备忘录、师资培训、设备装调、标准和资源开发等一系列准备工作后，最终由天津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天津机电职业技术学院与印度金奈理工学院合作，

携手知名中资企业共同建设。其初衷则是跟随中资企业“走出去”的步伐，为在印中资企业培养急需的本土技术人才。印度鲁班工坊占地1200平方米，开设光伏发电技术与应用、数控设备应用与维护、机械设计与制造（3D制作）和工业机器人技术4个专业。工坊内建设了4个专业及工程实践创新项目、新能源汽车项目共6个实训区，是中国特色职业教育产教融合、

校企合作办学模式在国外落地生根的典范。

从最初的计划，到建成揭牌，再到今天的发展壮大，印度鲁班工坊无疑凝聚了中印双方团队的大量心血与汗水，更体现了双方的精诚合作精神。印度的天气一直很热，金奈的气温都在30度以上，设备调试、师资培训等工作虽然在10至12月份进行，但是炎热的天气还是让老师们满身大汗。中方老师们经常下飞机后直接由机场直接赶往实验室，他们顾不上倒时差、换衣服，分秒必争，力求将筹备工作做到尽善尽美。印方的师生也全力配合，为项目的顺利实施提供了一系列必要的支持。正如金奈理工学院老师库马尔所说：

“印度鲁班工坊在人才培养、促进两国合作交流上取得一定成绩，得到印度社会各界广泛赞誉。”

搭建桥梁，构建多平台国际合作新格局

印度鲁班工坊自揭牌启动六年多来，成功搭建了中印双方在职业教育专业建设、人才培养、职教论坛、师生培训、技能竞赛等多方面多维度的交流平台，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印度鲁班工坊于2023年3月顺利通过验收评估。评估专家组一致认为，印度鲁班工坊建设定位准确，设计规划科学，完整诠释了鲁班工坊品牌的核心要义，在品



2017年12月8日，印度鲁班工坊正式揭牌启运。（图片由天津轻工职业技术学院提供）

牌塑造、内涵深化方面起到积极作用。印度鲁班工坊已经成为中印两国职业教育合作名片。

印度鲁班工坊开发编写了4个国际化专业教学标准、5个课程标准，公开出版了5本国际化双语教材，持续开发、分享了包括5套虚拟仿真软件在内的大量配套数字化教学资源，建设了印度鲁班工坊网站，推动印度鲁班工坊数字化转型。

印度鲁班工坊不仅培养了金奈理工学院本校学生，还承接了印度其他学校、其他国家学生培训和企业员工培训的工作，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印度鲁班工坊在建设过程中，先后召开了三次中印职业教育论坛，中印专家学者分享了各自国家职业教育的理念、模式、

方法和资源，增进了中印双方职业教育交流与合作，扩大了鲁班工坊知名度。2018年12月，在印度召开了首届中印职教论坛，中印校长汇报了鲁班工坊建设情况和经验。印度鲁班工坊学生Alex在论坛上讲述了在鲁班工坊的学习经历和到中国参加大赛的感受，他说：“我在鲁班工坊学到了很多专业技能，我爱天津，我爱中国。”

印度鲁班工坊建设过程中，中方先后接待了印方教师19人、学生9人来津培训，派出中方教师23人、学生1人访问印度，中印师生在此过程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鲁班工坊工程实践创新项目(EPIP)的教学方法给印度鲁班工坊教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位印度鲁班工坊



印度鲁班工坊学生参加 2018 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图片由天津轻工职业技术学院提供）

教师曾表示，“这种的教学理念主要关注基于技能的培训方法，这是一种非常好的教学方法”。此外，中印师生在培训交流的过程中也加深了相互了解，真正实现了民心相通。

2018-2019 年，印度鲁班工坊先后派出 4 个团队到天津进行培训并参加中国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2020 年，天津轻工职业技术学院派出学生李占芳赴印度与鲁班工坊学生组成联队参加印度孟买“Techfest 智能鼠”比赛，取得优异成绩。2018 年，印度金奈理工学院一名教师带领三名学生来中国接受培训，并参加中国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风光互补发电系统安装与调试项目”国际邀请赛，获得优胜奖。中印师生在培训、交流和参赛的过程中实现了共同成长，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一名印度参赛

学生写道：“这对我而言，是段很棒的经历，学到了在本校学习之外的知识。企业培训对我们顺利参赛很有帮助。此外，我还结识了一些可爱的好朋友。”

印度鲁班工坊还实现了功能持续拓展。2019 年 5 月，中印院校、企业及研究机构共同成立中印职教联盟。2022 年，天津轻工职业技术学院作为发起单位之一加入金砖国家职业教育联盟。2023 年 11 月 28 日，天津轻工职业技术学院作为金砖国家职业教育联盟印度国别工作组牵头单位，承办了由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主办的金砖国家职业教育联盟 2023 年第四期“职通世界——空中工作坊”。当时在华培训的五位印度金奈理工学院教师同中方一起在线下参加了会议，Gokul Patnam Selvam 老师以“技能发展，打造一个更绿色、更可

持续的世界”为题做了演讲。

前景广阔，引领职业教育国际合作新范式

印度鲁班工坊的建设吸引了海内外广泛关注，中印媒体对印度鲁班工坊进行了多次报道。

2019 年 10 月，中印两国元首在印度金奈举行第二次非正式会晤。中国媒体对印度金奈理工学院校长和师生进行了采访。印度金奈理工学院校长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非常欢迎习主席来印度，来金奈。我去过中国好多次，希望两国关系越来越好，特别是在教育领域。”

印度鲁班工坊是首个在应用技术大学建设的工坊，也是首个由两个金砖国家联手建设的鲁班工坊，它不仅为中资企业培养急需的本土技术人才，更塑造了“教随企出”的典型，架起了中印职业教育的新桥梁，搭建起了中印人文交流的新平台。印度鲁班工坊未来发展前景广阔，大有可为。📌

本文作者李云梅为天津轻工职业技术学院院长；王丹阳为天津轻工职业技术学院教师；天津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刘利超、霍琳、王娟、张梦龙等教师均对本文有贡献。

脱贫攻坚的中国经验

文 / 支振锋

中国也积极参与全球贫困治理，不断深化减贫领域交流合作，推动建立以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减贫交流合作关系，携手增进各国人民福祉。

贫困是人类社会的顽疾，是全世界面临的共同挑战。就我个人而言，贫困也曾经是我的人生经历。我在河南出生、长大，直到1997年到西安读大学。在我的记忆里，家乡山河秀美，但极其贫困。每到年底，青黄不接，都有一些亲戚邻居到我家借粮食。尽管我家也不富裕，母亲也总是想办法给他们匀一点。吃饱饭，摆脱贫困，是我少年时的渴望。

中华民族是历史悠久、勤劳智慧的民族，创造了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但从1840年

英国发动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饱受西方殖民者的侵略、掠夺、压迫，特别是日本长达十四年侵华战争的摧残。到1949年中国共产党建立新中国时，战火后的中国遍地焦土、一穷二白，处于极端贫困的状态。中国的贫困规模之大、贫困分布之广、贫困程度之深世所罕见，贫困治理难度超乎想象。

70多年来，中国组织实施了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力度最大、惠及人口最多的脱贫攻坚战。2021年2月25日，习近平主席在全国脱贫攻坚总

结表彰大会上庄严宣告，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中国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占世界人口近五分之一的中国全面消除绝对贫困，提前10年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减贫目标，不仅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件，也是人类减贫史乃至人类发展史上的大事件，为全球减贫事业发展和人类发展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

几十年来，在中国发生了什么样的减贫成就，已经是自有目共睹。在减贫事业上，中国

显然是做对了什么。但问题的关键是，中国为什么能够做对？中国政府分别于2016年10月发布的《中国的减贫行动与人权进步》和2021年4月发布的《人类减贫的中国实践》两份白皮书清晰地阐明了中国能够取得减贫奇迹的秘诀。

一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坚强领导核心。中国人民的勤劳、智慧、勇敢，不怕吃苦、不怕困难、不怕流汗，是中国能够取得人类减贫奇迹的首要原因。更关键的是，勤劳的人民需要坚强的领导。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能够取得减贫奇迹的强大保证。从诞生之日起，中国共产党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初心使命，团结带领人民为创造自己的美好生活进行了长期艰辛奋斗。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既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结底是让全体人民过上好日子。100多年来，不管国际国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始终坚守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以坚定不移的信念和意志，团结带领人民与贫困作斗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采取一系列超常规政策举措推进脱贫攻坚，努力让贫困群众有更好的收入、更好的教育、更好的医疗卫生服务、更好的居住条件。把群众满意度作为衡量脱贫成效的

重要尺度，集中力量解决贫困群众基本民生需求。

二是把减贫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贫困地区发展条件差，贫困人口自我发展能力弱，消除贫困仅仅依靠个体、区域、民间等力量远远不够，必须作为执政党和国家的责任，上升为国家意志、国家战略、国家行动。中国共产党始终把消除贫困作为定国安邦的重要任务，制定实施一个时期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提出国家中长期发展规划建议，都把减贫作为重要内容，从国家层面部署，运用国家力量推进。几代中国共产党人，锚定一个目标，一茬接着一茬干。自20世纪70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不断加大扶贫力度，成立专门扶贫工作机制，确定重点扶持地区和群体，安排专项资金，制定适合现实国情的贫困标准和专门的优惠政策，确定了开发式扶贫方针。中国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有计划有组织的大规模开发式扶贫，先后实施了《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994-2000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等中长期扶贫规划，减贫成为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把脱贫攻坚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统筹谋划、强力推进。从党的

领袖到广大党员干部，情系贫困群众、心怀减贫大业，全党目标一致、上下同心，制定印发《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指导意见》等政策文件，明确目标、路径和具体措施并一以贯之抓下去。

三是用发展的办法消除贫困。贫困问题说到底发展问题。作为拥有14亿人口、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发展是解决包括贫困问题在内的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中国共产党始终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集中精力搞建设、谋发展，通过发展解决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

四是立足实际推进减贫进程。中国立足本国国情，根据不同发展阶段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根据贫困人口规模、分布、结构等的变化，科学制定减贫标准、目标、方略，不断创新减贫理念、方法、手段，循序渐进、持续用力、滴水穿石。新中国成立后，主要是通过社会制度变革和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减缓贫困。改革开放以来，主要是通过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增长带动减贫，重点采取开发式扶贫方针，引导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以市场为导向，调整经济结构，开发当地资源，发展商品生产，提高自我积累、自我发展能力。进入新时代，在继续坚持开发式扶贫的同时，

实施精准扶贫方略，扶贫路径由“大水漫灌”转为“精准滴灌”，资源使用方式由多头分散转为统筹集中，扶贫模式由偏重“输血”转为注重“造血”，考评体系由侧重考核地区生产总值转为主要考核脱贫成效。

五是发挥贫困群众主体作用。贫困群众是脱贫致富的主体。中国充分尊重、积极发挥贫困群众主体作用，激发培育贫困群众内生动力，增强参与发展、共享发展、自主发展的能力，使贫困群众不仅成为减贫的受益者，也成为发展的贡献者。中国减贫实践表明，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推动者，是顶天立地的真正英雄。只要坚持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激励贫困群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内生动力，就一定能够战胜贫困。

六是汇聚各方力量形成强大合力。扶贫减贫是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调动各方积极参与。为打赢脱贫攻坚战，中国共产党依托严密组织体系和高效运行机制，广泛有效动员和凝聚各方力量，构建政府、社会、市场协同推进，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互为补充的大扶贫格局，形成跨地区、跨部门、跨单位、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多元主体的社会扶贫体系。

联合国发展系统、世界银行以及部分发达国家等国际社



2020年5月15日，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十八洞村扶贫队长麻辉煌与返乡大学生施林娇一起直播推销当地土特产。十八洞村曾是典型的苗族贫困村，2016年实现了整村脱贫摘帽。2019年，全村人均纯收入由2013年的1668元上升到了14668元。（摄影/新华社陈思汗）

会曾经为中国减贫提供了宝贵支持和援助，中国也积极参与全球贫困治理，不断深化减贫领域交流合作，推动建立以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减贫交流合作关系，携手增进各国人民福祉。中国向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大洋洲和欧洲等地区16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多种形式的援助，减免有关国家债务，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减贫提供实实在在的帮助。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也是要推动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合作，支持帮助相关国家更好实现减贫发展。据世界银行研究报告，共建“一带一路”将使相关国家760万人摆脱极端

贫困、3200万人摆脱中度贫困。当前，中国正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南太平洋地区等推进一系列实施惠及民生的国际减贫合作项目。中国的减贫实践证明，贫穷不是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的代名词。作为中国的亲密邻居，我们也愿意看到南亚地区取得更大的减贫成绩，能够携手推进国际减贫进程，为构建没有贫困、共同发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更大贡献。❶

本文作者支振锋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

魏风江：中印文化交流的桥梁

文 / 拉吉夫·拉詹 (Rajiv Ranjan)

魏风江教授是一位具有开创性的中国学者，也是中印两大文明友好往来的使者。他深受印度传奇诗人泰戈尔的影响，毕生致力于促进中印之间的文化交流、增进两国人民的友谊。

不论是在印度还是中国，都有许多村镇出身的学者志士。他们往往富有奉献精神、远见卓识和理想主义，对社会充满热情和责任感，为后人的美好生活辛勤付出，为社会发展作出重大贡献，因而成为人们心目中的榜样。

魏风江 (1912-2004) 就是这样的人。他出生于浙江萧山河上镇，曾任浙江省政协委员、浙江省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理事、中国南亚学术研究会顾

问，是原绍兴市越秀外国语学校（现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首任校长。但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或许在于，他是印度文学巨匠泰戈尔唯一的中国学生。

访印之旅

1924年，泰戈尔访问中国，成为当年轰动全国的大事。访问期间，泰戈尔发表了精彩的演讲，真诚地表示希望印度和中国能够互派学生，学习彼此的历史和文化，这一立场得到

了许多印度知名学者的支持。不过，由于国际形势动荡、爆发战争等原因，这个提议曾一度被搁置。1928年，教育家蔡元培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后，提议终于得以实施。蔡元培与泰戈尔长年交好，两人都希望建立一个促进中印交往的社会团体，实现派遣中国学生赴印留学的构想。

在那个年代，欧美国家对中国留学生的吸引力远大于印度，直到蔡元培的一位“徒孙”

自愿赴印学习，这一局面才有所改变。这位“徒孙”正是魏风江（魏风江的老师谭云山是蔡元培的学生）。1933年，蔡元培创办的中印学会计划派中国学生赴印留学，魏风江放弃了去西方深造的机会，决定去泰戈尔创办的印度国际大学研究印度历史和文学。

师从泰戈尔

两人初次见面时，泰戈尔称魏风江是第一只从中国飞往印度国际大学的“雏燕”，欢迎他在圣蒂尼克坦建“巢”。魏风江送给泰戈尔一套线装的杜甫诗集。泰戈尔翻看着古诗，微笑着说道：“杜甫写了很多人民的苦难，这样的诗人在印度非常罕见。印度诗人更擅长围绕灵感、人物和神灵写作。”听到泰戈尔对中国诗歌的深刻见解，魏风江感到十分惊讶。

20世纪30年代，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期间，泰戈尔曾说：“我们印度人民与中国兄弟并肩作战，共同对抗侵略者。中印两国有数千里的边境线，通道不计其数。这些通道不是用战骑和机枪打开的，而是往来不绝的和平使者走出来的。”他对魏风江说：“你是近一两个世纪里第一个到印度留学的中国人，要肩负起沟通中印文化、融洽中印感情的重大使命。”

魏风江留学印度六年，获得了学士和硕士学位。他平日跟随泰戈尔学习，也常常把中

国的诗歌和绘画介绍给泰戈尔。此外，魏风江还结识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圣雄甘地等印度杰出人物。

1939年春，因战争局势紧张，魏风江告别了印度国际大学的师友，回到了祖国。回国后，魏风江被当时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任命为外事秘书。此后多年，魏风江在浙江农业大学（现浙江农林大学）、杭州师范学院、杭州商学院、上海新沪中学等多所院校任教。几十年来，他始终致力于促进中印之间的文化交流、增进两国人民的友谊。

1987年，魏风江在时任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和印度驻华大使的邀请下再次访问印度，参加一场南亚研究主题的学术会议。魏风江重游故地，回忆起师从泰戈尔的岁月、与尼赫鲁家族三代人的交往以及与甘地共度的时光。在《我的老师泰戈尔》一书中，魏风江记录下他和印度友人之间的深厚友谊。

魏风江作为泰戈尔唯一的中国学生，赴印期间受到特别关照。泰戈尔常与魏风江谈论自己访问中国的经历，称赞中国是一个充满诗意的国家。泰戈尔曾对他说，很向往杭州西湖，而魏风江的家乡正好离西湖不远。他们还时常谈起梅兰芳的戏和丰子恺的画。

培育杰出人才

魏风江多年来笔耕不辍。

他一面教授英语课程，一面撰写回忆录，留下了《在甘地先生家里》《漫话诗人泰戈尔故居今夕》《我所认识的印度国大党先辈领导人物》《印度重访记》和《我的老师泰戈尔》等作品。

2004年，魏风江在杭州因病去世，享年93岁。他的墓碑十分别致，碑的左侧，几笔简单的线条勾勒出泰戈尔的肖像，碑的右上方刻着：“风，日夜吹拂；江，川流不息；我，永不疲惫。”这是他的座右铭，也是他一生的缩影。

拥有丰富的人生经历是幸运的，这样的人往往乐意将经历故事分享给年轻人，也有一些人选择创立教育机构，致力于培养有远见卓识的人才。比如泰戈尔就亲自创办了印度国际大学。1979年，教育家邵鸿书开始创办绍兴市越秀外国语学校，魏风江也加入其中。魏风江一如他的老师们，在这所学校任教多年，培养出成千上万的学生，赋予他们多元文化的价值观念。如今的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仍然秉承着魏风江的教风，致力于培养更多的杰出人才。

本文作者拉吉夫·拉詹（Rajiv Ranjan）为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印度籍专家，在中国工作生活已有六年，曾多次前往全国各地参与学术交流活动。

为什么中国能建设 世界一流大学？

文 / 苏廷德拉·库尔卡尼 (Sudheendra Kulkarni)

中国最高领导层给予大学的强大支持是决定性因素，提升了高等教育质量，推动了科研发展并促进其研究成果在工业、农业和服务业中应用。

去年6月，位于北京的清华大学邀请我参加一场主题为“中印关系与文明互鉴”的研讨会。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是中国最顶尖的两所大学，其中清华大学在2023年《泰晤士高等教育》发布的世界大学排名中，位列第16位。访问期间，当我漫步在清华大学风景如画的校园，苏世民书院引起了我的注意。

据了解，该书院是由黑石集团的创始人苏世民(Stephen

Schwarzman) 创建。黑石集团是全球最大的私募股权公司之一，管理的资产价值高达1万亿美元。这位知名美国商人从塞西尔·罗兹设立的著名“罗兹奖学金”获得了灵感，遂以个人名义向清华大学捐赠了1亿美元，用于创立苏世民学者项目。每年，来自世界各地的200名学生在苏世民书院完成为期一年的硕士学位课程。作为中国最负盛名的大学之一，清华大学有着广泛的国际联系。

扎克伯格、纳德拉和马斯克都曾是清华经管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清华经管学院是全球最好的商学院之一，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库克是其顾问委员会现任主席。

清华大学和中国其他世界一流大学一样，均为中央直管高校，享受中央政府财政拨款。这不禁让我深思：为什么印度没有任何一所公立大学能获得如此广泛的国际认可？为什么在中美贸易局势紧张以及美国

限制对华高科技产品出口的大背景下，美国商业巨头还是如此慷慨地为中国大学捐钱助学？

第一个问题的答案不难。除了印度理工学院、印度管理学院和几所中央大学以外，印度许多公立大学，特别是各邦的公立大学，都陷入了平庸。印度政府也没有兴趣推动大学更加国际化的发展，对招收国际学生、招聘国际教师或邀请著名外国人加入其咨询委员会兴趣寥寥。

“美国头部公司都知道，中国不仅是其产品的重要市场，更是高科技产品的制造者，占据着越来越多的世界市场份额。”

至于第二个问题，苏世民本人给出了最好的答案。在解释为什么选择捐助中国大学时，他表示：“未来世界的领导者必须了解今天的中国。”美国头部公司都知道，中国不仅是其产品的重要市场，更是高科技产品的制造者，占据着越来越多的世界市场份额。我曾参观过深圳企业大疆、华为和比亚迪的总部。大疆是全球最大的无

人机制造商，占据全球市场份额一半以上。华为是全球最大的电信设备供应商，在智能手机市场上也是苹果和三星的强劲竞争对手。2011年，马斯克曾嘲笑中国汽车制造商比亚迪永远无法与特斯拉竞争。如今，比亚迪很快会成为全球排名第一的电动汽车制造商。

正因为中国在高等教育和研究方面取得了如此卓越的成就，其技术才发展到了今天如此高的水平。中国大学和研究

机构在发表科学论文方面一直领先于美国，中国研究者发表的论文被世界知名期刊大量引用。自2019年以来，中国也一直是国际专利申请的最大来源国，申请数量超过美国的两倍。

中国最高领导层给予大学的强大支持是决定性因素，提升了高等教育质量，推动了科研发展并促进其研究成果在工业、农业和服务业中应用。2021年

5月28日，中国科学院第二十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五次院士大会和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强调，国家实验室、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都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要自觉履行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使命担当。他呼吁中国要在深海、深空、深地、深蓝等领域积极抢占科技制高点。会议达成共识，中国必须在人工智能、半导体芯片、量子计算和绿色能源等关键技术上实现自力更生。同时，会议还强调，自力更生并不意味着闭门造车，自主并不排斥向他人学习或建立国际合作伙伴关系。

如果没有优秀的领导、研究人员和教师，大学就无法达到全球一流的水平。习近平强调，两院院士是国家的财富、人民的骄傲、民族的光荣。■

本文作者苏廷德拉·库尔卡尼（Sudheendra Kulkarni）为印度“新南亚论坛”创始人。

重温百年前泰戈尔访华之旅

文 / 苏拉加·泰戈尔 (Souraja Tagore)

1924年，印度诗圣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访华，为中印两大古老文明延续文化交流奠定了重要基础。百年之后，我们一行人追随泰戈尔的脚步到访中国，深深感受到他作为中印文化交流使者持久的影响力。泰戈尔的思想至今仍滋养着中印之间的深厚情谊，引导两国人民相互尊重、相互欣赏。

为纪念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1924年访华之旅，2024年4月10日至18日，我以舞蹈家和泰戈尔家族成员的身份，与一众印度艺术家、学者和记者访问了中国。我们追随泰戈尔曾经的足迹，走访了北京、深圳和上海等地，既参观了历史景点，也参加了多场研讨会和文化活动，与中国学者、艺术家进行了交流。

2019年，我曾作为婆罗多舞和泰戈尔舞蹈的表演艺术家访问中国。当时我在位于西安的陕西师范大学参加了一场国际会议和文化交流活动，受邀发表题为“印度和中国的传统舞者对话”的演讲。那次访问让我深刻感受到中国学者和艺术家对泰戈尔的敬重。但我不得不承认，那次访问时，我还未能全然理解泰戈尔对中国

的影响是多么深远。今年再次来到中国，我才真正意识到泰戈尔百年前那趟访华之旅的重要性。泰戈尔能在中国赢得如此经久不衰的欣赏，想必是因为他丰富了许多人的精神世界。

友谊难忘

在泰戈尔童年时期，他的父亲就曾游历中国各地，料想泰戈尔年少时一定听过不少关

于中国的故事。早在1924年访华之前，泰戈尔就写过不少关于中国的文章，如1881年谴责英国在中国倾销鸦片的文章《在中国的“死亡贸易”》，1893年的长诗《大地》，1902年的文章《中国朋友的信》等，字里行间洋溢着热情和好奇。著名的东方学家西尔万·列维进一步激发了泰戈尔对中国的好奇心。由泰戈尔创办的印度国际大学位于印度圣蒂尼克坦，列维是这所学校的第一位访问教授。上世纪20年代初，正是列维向泰戈尔提议，把印度国际大学建设成印度和中国之间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

泰戈尔原计划于1923年访问中国，但直到次年4月北京“讲学社”向他发出邀请才真正成行。尽管泰戈尔关于“灵性主义”和“东方主义”的观点颇具争议，一些人认为这些观点是反科学、反现代性的，但泰戈尔抵达中国时依然受到了热烈欢迎。

泰戈尔带着亚洲首位诺贝尔奖得主的殊荣，在中国发表了重要演讲，与中国朋友建立了深厚友谊。泰戈尔一生中从未曾忘记他的中国朋友以及在中国的旅程。1941年2月，他在临终前所写下的《生辰集》里的第三首诗便是很好的证明：

记得我去中国
陌生人在我前额



2024年4月，北京市西城区，苏拉加·泰戈尔（第一排，左一）、著名诗人舒婷（第一排，中）、徐善曾（第二排，右一）等人在一场午餐活动结束后合影留念。（图片由作者提供）

点了友谊的红色，
称我为亲者。
不知不觉地
陌生感消失。
意料不到的
欢乐情谊显现
一个永恒的人。
我得了中文名，
身穿中式裳。
我心中豁然开朗
友谊来临
使我新生。
他赐给我生命之珍。

早在泰戈尔第一次访华前，将他的诗作译成中文的工作就已经启动，除了《吉檀迦利》外，《新月集》也是最受欢迎

追随泰戈尔的足迹

时光匆匆走过百年。2024年4月，中国多所大学和文化机构开展了泰戈尔访华的纪念活动。泰戈尔访华之旅的第一站是上海，不过现在北京在中国人生活中的分量更重一些，因此我们的旅程从北京开启。我们参加的第一场活动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亚研究中心《南亚研究》编辑部负责组织工作。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院长李向阳为我们致欢迎辞，中国社会科学院秘书长赵志敏在致辞中讨论了中印文化交流的机遇，我的演讲题目则是“竺震旦：拥有自由灵魂的人”。

社科院的环境非常吸引我。我们开会的场地在一座两层建筑里，我很喜欢它外露的砖墙和砖红色栏杆，满院盛开的丁香花也令我沉醉。不过那时我还没意识到，我的“丁香”之旅才刚刚开始。年轻的中国学者纷纷祝贺我演讲成功，并邀请我在他们图书馆收藏版本的泰戈尔作品《新月集》和《飞鸟集》上签名，这是我头一回感受到作为泰戈尔后人能够在中国如此广受欢迎，这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因此我更应保持谦逊。

2024年4月12日，我们在北京大学参加了泰戈尔访华一百周年纪念的联谊活动。活动在北京大学民主楼举行，王靖老师介绍了与会嘉宾，陈明教授致欢迎辞，我发表了题

为“泰戈尔与中国的艺术关联”的演讲。北大学生的表演让这场精心组织的研讨会变得更加精彩，他们朗诵了泰戈尔的中译诗作，演唱了泰戈尔歌曲，表现令人印象深刻。人们常说，泰戈尔是属于世界的诗人，这场表演的确让我感受到了泰戈尔的文化能量。

接下来我们去了深圳，这是我首次到访这座城市。深圳给了我许多惊喜。首先是我在深圳大学遇到了董友忱教授，他是中译本《泰戈尔全集》的编辑，也是国际孟加拉学研究会的会长。董友忱教授今年85岁高龄，他微笑着问候我，说这次见面他已经期待了一年多。正当我准备用蹩脚的中文向他问好时，他开始用流利的孟加拉语与我交谈。董友忱教

授双眼闪烁着光芒，向我询问道：“你是来自马哈拉贾·乔德拉·莫汉·泰戈尔家族吗？”他握着我的手，听我解释了家族渊源，并向我赠送了凝聚他一生心血的中文版《泰戈尔全集》。经过与董友忱教授的一番交谈，我感到震撼，又感到惭愧。

研讨会结束后，我们来到一个荔科技园，那里的绿树青草间矗立着一尊泰戈尔的半身雕像，这座雕像是由印度文化关系委员会赠送给深圳大学的。78岁的郁龙余教授是深圳大学印度研究中心主任，他带领我们参观了谭云山中印友谊馆，那里也让我印象深刻。郁龙余教授向我们介绍了深圳大学印度研究中心在印度艺术、文学方面，尤其是关于泰戈尔文学，所做的大量研究。“你既能说也能懂泰戈尔使用的孟加拉语，所以研究他对你来说很容易。”郁龙余教授用流利的印地语解释道：“但我们必须依靠翻译，所以我们开展研究工作要难一些。”

接着我们访问了上海，那里是泰戈尔1924年访华的第一站。我对上海印象最深的是南昌路与茂名南路交叉的街心花园，那里有一尊泰戈尔的半身铜像，旁边还有一把椅子。我的中国朋友说，人们会坐在这把椅子上朗诵或吟唱泰戈尔的诗句来纪念他，于是我的脑海中浮现出《百年后》里的诗句：



苏拉加·泰戈尔参演了中印联合编创的当代舞剧《贝玛·莲》，该剧诠释了中印两国文化对男性和女性的理解，体现了两国舞蹈艺术的交融。（图片由作者提供）

百年后的今天，
专心读我这首诗的你是谁？

在上海，我们还参加了同济大学组织的中印文化交流活动，参观了“泰戈尔与同济”展览，与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

的泰戈尔舞步时，这些句子就浮现在我的脑海中。我教给他们的舞蹈动作和神态并不难，这些学生很容易就捕捉到了泰戈尔创作的歌曲《花朵摇曳》的精髓。艺术的确具有超越语言、跨越文化壁垒的力量，这些学生用他们优雅的舞姿证明

中漫步，重温徐志摩与泰戈尔交往的过往，我心中浮起一丝伤感，我想或许他的心情也是如此。

至此，我的中国之行画上圆满句号。我带着温暖的记忆和深切的友谊离开了北京。我在中国收获的每一份友谊，都源自人们对泰戈尔及其诗歌的喜爱和欣赏。一百年前，泰戈尔抵达上海汇山码头时，留着银白色胡子，身穿棕色长袍，头戴红色软帽，他迎着雷鸣般的掌声，走向码头上热情迎接他的人群。中国的文化界人士激动难抑，众多文化名人和媒体记者屏息以待，密切关注着泰戈尔的一举一动。如今泰戈尔已经离世，但他的艺术、文学、诗歌、音乐作品和哲学思想依然激励着全世界无数的人。正因如此，泰戈尔永远活在人们心中。📖

“今年再次来到中国，我才真正意识到泰戈尔百年前那趟访华之旅的重要性。泰戈尔能在中国赢得如此经久不衰的欣赏，想必是因为他丰富了许多人的精神世界。”

进行交流。我们到访了晋元高级中学，与那里的教师交谈，并举办了关于泰戈尔舞蹈的工作坊。泰戈尔曾在《印度文化的核心》一文中写道：“我们几乎完全忽视了培养审美，审美的土壤未经耕耘，杂草丛生……音乐和艺术都是一个民族实现自我表达的重要途径，没有音乐和艺术，人们难以表达对美的感受……我们的灵魂也必须找到合适的表达渠道。在诗歌、音乐和艺术中，人类得以完整地表达自我。”

我在教年轻中国学生基础

了这一点。

文化力量生生不息

这次旅程的一大亮点是法源寺的百年丁香诗会。法源寺被誉为北京最美的寺庙之一，历史可以追溯到1400多年前。1924年，泰戈尔在中国诗人徐志摩的陪伴下，曾到访这座古寺，欣赏那里的传统建筑和满园的丁香花。百年后，我在百年丁香诗会上遇到了徐志摩的孙子徐善曾先生。徐善曾先生比我年长几岁，见面后感觉他就像我的老朋友。我们在寺

本文作者苏拉加·泰戈尔（Souraja Tagore）是一名古典婆罗多舞者，拥有30多年专业表演经验。她在博士论文中研究了祖先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的作品，并致力将泰戈尔独特的舞蹈理念融入她的古典舞训练中，从而为当代观众重现泰戈尔舞蹈的精彩表演。

诗圣依然神采奕奕—— 纪念泰戈尔访华 100 周年

文 / 郁龙余

泰戈尔访问中国100周年这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中印现代关系史，以及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

1924年，印度诗人泰戈尔搭乘的客轮在上海汇山码头缓缓靠岸，正式开启了他的首次访华之旅。他的这次访问为当时的华夏大地带来了清新悠扬的文化气息，更为中印文化交流史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今年是泰戈尔访问中国100周年。回顾历史，泰戈尔呕心沥血，完成修复中印文化交流之路的艰巨使命，从而大大拓宽中国与印度译介研究彼此语言文学的领域。他的历史功绩，以及对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永载史册。

中印文化交流史上的大事件

泰戈尔访问中国100周年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中印现代关系史，以及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上，都有着重要的意义。读泰戈尔这个人以及他的书，对于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走向，关系重大。过去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为什么是这样？

首先，中国现代一流人物，包括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文学家、艺术家，例如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鲁迅、蔡元培、徐悲鸿、徐志摩、

郑振铎、胡适、冯友兰、汤用彤、季羨林、饶宗颐等，都有“中西印三通”的特点。而泰戈尔及其作品，则是印度现代文化史的一座圣殿。

当代著名学者孙宜学写过一本《泰戈尔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对中国现代最著名的20多位知识分子，从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陈独秀，到末代皇帝溥仪，无论其对泰戈尔的态度是拥护还是反对，做了一一介绍评述，足见泰翁对现代中国上层人物影响之巨大。

泰戈尔在中国的影响，曾

出现过一巨大曲折。这个巨大曲折，和中华民族自我认知及国际地位的变化，有着紧密联系。自1920年，泰戈尔及其作品来到中国，就出现了“拥泰派”和“倒泰派”的激烈争议。这支“倒泰派”队伍不小，他们都是民族精英，一支很有影响的左派队伍。“拥泰派”和“倒泰派”之间的激烈争论，是泰戈尔作品在中国传播的真实反映，引起了一些国内外人士的注意与不解。经过冷静观察与研究，我认为：“中印两国独立解放的道路不同，中国走的是革命道路，印度走的是非暴力道路；打倒推翻的对象不同，中国要打倒推翻反动政府，印度要赶走英国殖民者；对传统文化的态度不同，中国是彻底批判传统文化，印度以传统文化为武器。‘泰戈尔的倡导维护东方传统文化的身份，与中国社会的前进方向，显得极不协调。’”

现在看来，这个争论只是一段插曲。了解并认识这段插曲，不但有助于我们正确理解泰戈尔在中国的传播史，而且有助于我们正确看待任何复杂的历史事件。

中国读者热爱泰戈尔的缘由

德艺双馨。中国人的人才观，追求德艺双馨。泰戈尔除了是世界闻名的大诗人之外，还是享誉世界的小说家、戏剧家、散文家、音乐家、画家、

美学家，同时也是教育家、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他的作品伸张正义，揭露丑恶，对妇女、贱民等社会弱势群体，充满同情与爱心。他的名作，不论诗歌、小说还是戏剧，莫不如此。读过他作品的人，像喀布尔人、莫哈玛娅等人的形象，都会永驻心头。泰戈尔在中国读者心目中宅心仁厚，多才多艺，既是道德的高峰，又是才艺的高峰，是德艺双馨的外国诗人之一。

名扬天下。毋庸置疑，泰戈尔的价值是西方人发现的，他因获诺贝尔文学奖而一举成名。但是，这仅仅是事情的一半。另一半是，西方需要泰戈尔。一位瑞士哲学家说：“泰戈尔降临于中欧兵劫以后的瓦砾场，使一群丧乱流离、惊魂未定的众生，得领略东方恬静和平的福音，以减杀其生命的悲哀。”在泰戈尔之前，诺贝尔文学奖只是一个西方人的奖项，不具有世界影响。泰戈尔的诗歌给西方文坛带来了清风，西方诗人欣喜不已。让西方人始料不及的是，诺奖给了泰戈尔荣誉，而泰戈尔却给诺贝尔文学奖带来真正的全球影响。只有在泰戈尔之后，诺贝尔文学奖才享誉东方，成为真正驰名国际的文学大奖。在中国读者心目中，泰戈尔是最有国际名望的外国诗人之一。

吹拂新诗。一位诗人在国外的影响，除了看其诗作的译

文是否受欢迎之外，更重要的是要看他的风格和思想是否被人接受，对他国的诗歌创作有否产生影响。“五四”运动吹响了新文化运动的号角，中国新诗由此产生。中国新诗的兴起，在形式和意象上，直接得益于泰戈尔。泰戈尔活泼短小的散文诗在当时兼有东西方双重色彩，又具有“小诗”的特征，所以备受青睐。“短短几年功夫，小诗在众多诗体中便脱颖而出。”（张新：《中国新诗史》）后来，中国出现“新月派”，无疑和泰戈尔的《新月集》有关。尽管这一诗派存在的时间并不长，但受泰戈尔诗风吹拂迅速涌现的“小诗”，成了中国新诗的主体。在中国读者心目中，泰戈尔是对中国影响最大的外国诗人之一。

名家译介。中国最早翻译泰戈尔的都是名家，如陈独秀、郑振铎、郭沫若、冰心、徐志摩等。其中，以郭沫若、冰心的影响最大。中国新诗第一人郭沫若，称自己的诗“第一阶段是泰戈尔式的”。中国新诗第一女诗人冰心说：“我自己写《繁星》和《春水》的时候，并不是在写诗，只是受了泰戈尔《飞鸟集》的影响，把许多‘零碎的思想’，收集在一个集子里而已。”他们的诗作，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后来，进入全面译介泰戈尔的时代，中国又涌现出石真、董友忱、白开元等一批卓越的翻译家。

2000年《泰戈尔全集》出版，即将出版的《泰戈尔作品全集》，其特色是全部译自泰戈尔原文，不再出现“转译”情况。在中国读者心目中，泰戈尔是拥有最多“粉丝”的外国诗人。

患难之交。泰戈尔不但是中国文化的知音，而且是中国人民的患难之交。中国抗战爆发后，一向称羡日本的印度人不知如何是好。泰戈尔是印度舆论的风向标，日本军国主义拼命拉拢他，给他送古瓷瓶，派诗人野口米茨郎套近乎，宣扬“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等。泰戈尔有一颗正义之心，很快看清了真相，写了《敬礼佛陀的人》，鞭挞日本侵略者。他和野口米茨郎的三封论战信，成了著名的《诗人对诗人》一书。在最后一封信的结尾，泰戈尔写道：“敬祝我所热爱的贵国人民，不成功，只懊悔。”患难见真情。

走进教材。中华以文教立国，课堂神圣。教材体现国家的教育立场，什么人的作品进教材是极为重大而严肃之事。我们曾这样说过：“泰戈尔赢得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尊敬和喜爱。在教育部推荐的中学生课外阅读书目和大学中文专业的阅读参考书目中，均有泰戈尔诗集。”（《泰戈尔诗歌精选·序》）泰戈尔走进了中国教材。中国有着全世界最多的中学生、大学生，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学生阅读着泰戈尔，

泰戈尔走进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心田。在中国读者心目中，泰戈尔是最亲近的外国诗人之一。

中国人喜爱泰戈尔是全方位的。周恩来总理1956年访问国际大学时，深情地说：“泰戈尔不仅是对世界文学作出卓越贡献的天才诗人，还是憎恨黑暗、争取光明的伟大印度人民的杰出代表……中国人民对泰戈尔抱着深厚的感情，中国人民永远不能忘记泰戈尔对他们的热爱。”2014年9月18日，习近平主席在印度发表题为《携手追寻民族复兴之梦》的重要演讲，他说：“泰戈尔的《吉檀迦利》《飞鸟集》《园丁集》《新月集》等诗集我都读过，许多诗句让我记忆犹新。他写道，‘如果你因为失去了太阳而流泪，那么你也失去了群星’，‘当我们是大为谦卑的时候，便是我们最接近伟大的时候’，‘错误经不起失败，但真理却不怕失败’，‘我们把世界看错了，反说它欺骗我们’，‘生如夏花之灿烂，死如秋叶之静美’，等等，这些优美又充满哲理的诗句给了我很深的人生启迪。”习近平主席的演讲赢得了一次又一次热烈的掌声。

2024年是泰戈尔访华100周年，这在中印文化交流史上，是一件值得庆祝和纪念的大事。为此，我做一首诗《诗圣依然神采奕奕——纪念泰戈尔访华100周年》：

一九二四年，非同寻常，
印度诗圣泰戈尔，
应孙中山先生之邀，
成功访问友好之邦。

一百年过去了，
诗圣在中国读者心中，
依然神采奕奕、可亲可爱，
不禁让我放声歌唱：

这是为什么啊，
因为他创作辉煌，
为古国印度的文学艺术，
建构了崭新的殿堂。

这是为什么啊，
因为他登上了诺贝尔奖榜，
让这个欧洲的奖项，
名声大振，享誉整个东方。

这是为什么啊，
因为他落在中国的心，
像种子一样生根开花，
这样灿烂，这样芬芳。

这是为什么啊，
因为世界出现新的动荡，
追求“兼爱”“不害”的人们，
要从他身上汲取“和”的力量。📖

作者郁龙余为国际著名印度学家、深圳大学印度研究中心主任。

泰戈尔对世界文化交流的启示

文 / 孙宜学

泰戈尔在西方和世界范围内推动东西方文化交流而进行的形象塑造过程，以及被接受和重塑的经验和教训，为当今世界文化交流提供了很多宝贵经验。

“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泰戈尔与中国文化、世界文化的复杂关系，经过一百多年的历史沉淀和过滤，已成为中印文化交流史、世界文化交流史上的经典课题，具有了经久弥新、日新月异的研究价值，不同时代、不同国家、不同研究者都不断对其作品和诗学、思想等进行新的意义发掘和阐释。

泰戈尔以作家身份成为印度和东方文化的象征，他在西

方和世界范围内推动东西方文化交流而进行的形象塑造过程，以及被接受和重塑的经验和教训，为当今世界文化交流提供了很多宝贵经验。

第一，文学译介和传播不应只局限于文本层面，而要以文化交流为目的，并且积极通过对话、文化互动等多种方式，全方位实现文化交流和融合。东西方文化交流客观上存在着不平等关系。西方文学在东方的译介传播，不但容易引发关

注并产生社会影响，还更容易影响到东方作家的文学创作；而东方作家作品却很难在西方引发社会关注和社会影响，影响西方作家的文学创作。虽然西方的“泰戈尔热”至今已过百年，泰戈尔诗歌已被各大世界文学选集收录，其文学也已进入世界文学行列，但迄今仍很难明确说泰戈尔影响了哪位西方知名作家的文学创作。因此，推动东西方文化真正实现平等交流，尤其对促进西方重



2024年4月15日下午，由6名印度泰戈尔研究学者、艺术家组成的“泰戈尔访华百年纪念活动——重走泰戈尔之路”印度访华团抵达同济大学，中外师生共同缅怀泰戈尔为中印文化交流作出的巨大贡献，深化中印两国人文交流合作。（图片由作者提供）

新认识东方文学文化，影响重大且意义深远。目前，以泰戈尔世界形象的建构为中心，认真考察东方文学在西方的文学交流和影响的历史、现状和未来，切实找到东西方文学和文化相互促进、深度融合的途径和规律，可以在更开阔的视域内，超越文本的局限，推动世界文化一体发展。

第二，世界文化交流要坚持文化平等原则，同时避免文化自负和文化自卑。世界不同文化之间的矛盾与共生是对立的统一，无时不处于碰撞与冲突之中，也无时不处于新的和谐共生关系之中。这个过程，文化强弱态势明显，且始终处于动态的抗衡与强弱变化过程之中。如中国近现代以来在“救亡启蒙图存”的压力下，就不

断汲取世界先进文化的力量，不断从传统走向现代、从封闭走向开放、从积弱走向富强。

世界文化交流史证明，任何民族文化的国际化的过程一定是危机重重的过程，充满着不可预知的矛盾、冲突，误解与质疑更是常态。不同民族的思维方式是有差异的，表达感情的方式和角度也不同。要减少传播障碍，保证传播效果，就必须秉承真诚的态度，重视总结分析不同文化交流历史上的偏误和认识上的不平衡、不均衡，甚至失衡的现象及原因，以科学精神理解和面对国别差异、文化差异，科学选择适合传播的内容和角度，准确设定传播路径，加强质量评估，尽量避免或减少重复性的阐释和简单的歧义性理解。同时不但

要直面文化差异和文化冲突，而且要善于利用文化差异找到本民族文化可以被接受和欣赏的土壤，然后实现与所在地文化语境由浅入深的融合，使本民族文化成为世界文化大家庭中自然的存在，促使实现不同民族文化和谐共生的“文化大同”理想。

一国文学文化的世界传播，常常会陷入盲目的文化自信或是文化自卑，从而无法实现不同文学文化间的平等交流。泰戈尔对不同民族文化交流的借鉴意义，首先体现在其主张的世界主义立场。他始终坚持世界一体下不同民族、国家间应平等交往，主张民族间的情感沟通与精神交流，倡导博爱、互助、友善的民族交往原则，主张东西方文化互补互惠，提倡采用灵活有效的文化交流策略，增进不同民族间的互助交流与友好合作。

泰戈尔坚持认为，不同民族文化平等，都能为世界贡献自身文化成果。针对西方的文化心理优势，泰戈尔另辟蹊径，把西方文明划分为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在泰戈尔看来，西方的心理优势和文化自豪感，建立在物质文明基础之上，而物质文明是以物质财富积聚为核心。过于强调物质占有，极易引发物质争夺，造成人情冷漠、人与人之间缺乏关爱。而印度文化所强调的博爱、友好、和平共处等道义原则，恰好能

有效补充西方精神文明的不足。当然，泰戈尔在看到西方精神文明缺乏的同时，也承认西方殖民主义视角下的落后、饥荒、愚昧的印度形象，其实源自印度落后的物质文明，因此主张印度应该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以弥补自身物质文明的不足。

泰戈尔始终坚持民族间的对话交流，并倡导友善、博爱、道义原则。他倡导超越狭隘民族主义局限的博爱精神，反对民族主义暴行，倡导道义原则下的民族交流合作。泰戈尔倡导的东西方文化交流客观上重塑了世界上的印度形象。他一方面否定了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文化心理优势，另一方面又为在西方宣扬印度文化找到了充足的理由。东西文化互补论还使泰戈尔站上道义制高点，为批驳西方文化的劣势与不足找到理据。泰戈尔批判西方文化虽引发了强烈的反驳与不满，但客观上也推动了西方重新审视印度文化。而只有重新审视印度文化，才能改变西方对印度文化和东方文化的片面认识，才能使西方认识到东西方文化之间只有表象的不同，却无本质差异，进而真诚推动东西方文化交流。

文化形象建构要客观全面，避免以偏概全。泰戈尔形象是一个复杂多元的复合体，因此，研究泰戈尔本人及其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一定要立足

其文学和思想实际，全面了解和理解其丰富、多元的思想体系，尽量真实还原、准确定位泰戈尔在世界文学史、文化史上的地位，避免误读和误导。

在当时特定历史文化语境下，泰戈尔为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也采用了一些文化交流策略。他把西方文化简单归结为以物质主义为核心、物质崇拜为导向，而把印度文化简单归结为以精神主义为核心、追求精神道德满足为导向，这种简单化概括难免失之偏颇，因为任何一种文化都不是扁平的，而是复杂多元且动态变化的。另外，为了避免造成印度在西方的负面形象，泰戈尔在某种程度上还刻意美化印度形象，回避如实描述印度社会存在的问题。如他在西方演讲中主要传播《奥义书》《薄伽梵歌》等充满大爱的印度文化经典，却对当时印度社会文化中的问题或闭口不谈，或刻意弱化，甚至将印度的种姓制度看作是维护民族团结、促进种族合作的有效途径，对“撒提”制度也刻意回避，或没有彻底批判。

这说明任何作家、任何民族的文学都是吸收了本民族和世界各民族文化滋养后结出的硕果，蕴含着本民族传统文化和当代文化的精华；任何作家、任何民族的文学也都具有天然的世界性，都自然是世界文学的一部分。优秀的文学作品都是人类自由安放灵魂的栖息

地，是世界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乃至全人类心灵的吟唱，表现人类最真挚、永恒的情感，满足人类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为人类提供语言的韵律之美，揭示普遍人性中真、善、美、诚、信、义等高贵品质，积极影响人类正确对待自我、生命、自然、世界、历史和未来。

然而，不同民族的文学表现这种世界性的方式和方法各有不同。为了实现世界文学和谐交流，各民族文学就要立足本民族文化积极寻找世界不同民族精神的共鸣，最终实现不同民族文化的和谐相处，共同发展，共生共进，从而使世界优秀多元文化同放异彩，人类精神形成和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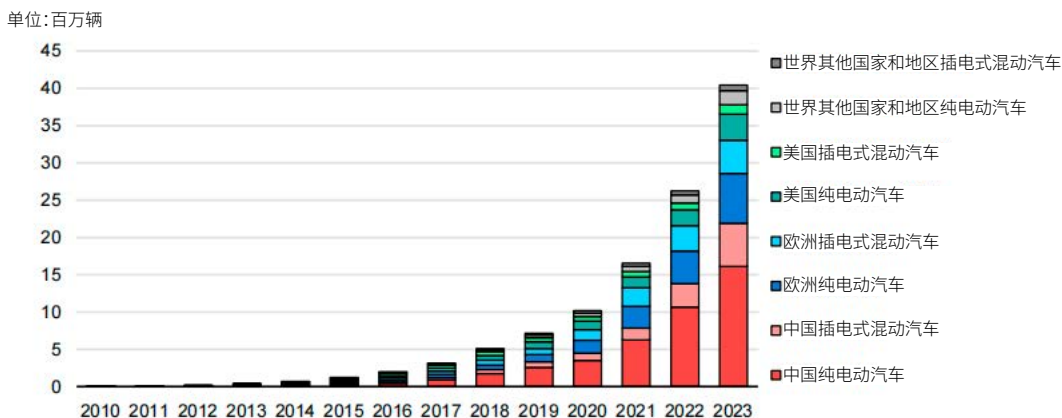
目前，世界范围内的泰戈尔研究多基于泰戈尔文学与思想的某一个方面展开，如泰戈尔的文学作品、泰戈尔的泛神论思想等，而要真正理解泰戈尔，必须在国别研究的基础上将泰戈尔现象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全面分析、综合研究，进而建构出真实可信的国别泰戈尔形象和世界泰戈尔形象。这对促进当前世界文学文化的交流合作与和谐共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40]

本文作者孙宜学为同济大学中德人文交流研究中心研究员、国际文化交流学院院长。

电动新视界： 2024 年电动汽车发展展望

全球电动汽车行业正步入前所未有的高速增长期，2024年被视为行业发展的关键里程碑。中国和印度作为全球重要的两个汽车市场，正引领电动汽车时代的变革浪潮。中国将继续在全球电动汽车市场中占据主导地位，促进全球电动汽车销量的飙升以及相关基础设施的建设。印度则依托政府举措与民众对电动汽车日益浓厚的兴趣，在电动汽车领域也展现出令人瞩目的发展成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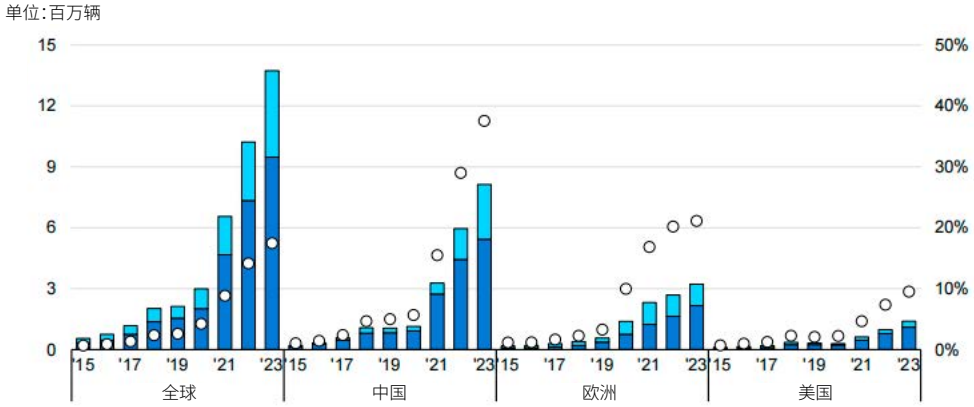
全球电动汽车存量发展趋势 (2018-2023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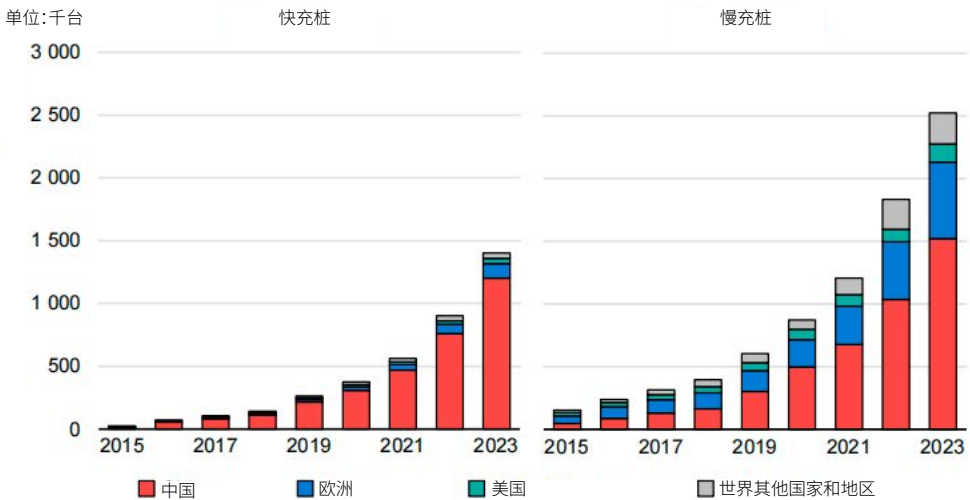
注：数据仅包括乘用车。

数据来源：国际能源署基于各国提交的数据以及来自欧洲汽车制造商协会、欧洲替代燃料观察站、电动汽车信息平台 EV-volumes 和全球汽车信息平台 Marklines 的数据分析得出。

不同国家或地区的电动汽车注册量和销售份额 (2015-2023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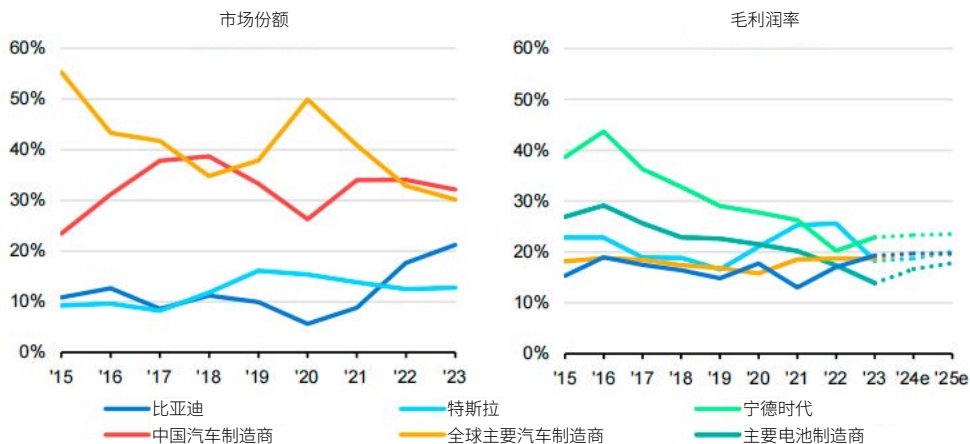
不同国家或地区安装的不同功率的轻型车公共充电桩数量 (2015-2023 年)



注: 图表中数值代表充电桩数量。
数据来源: 国际能源署基于各国提交的数据分析得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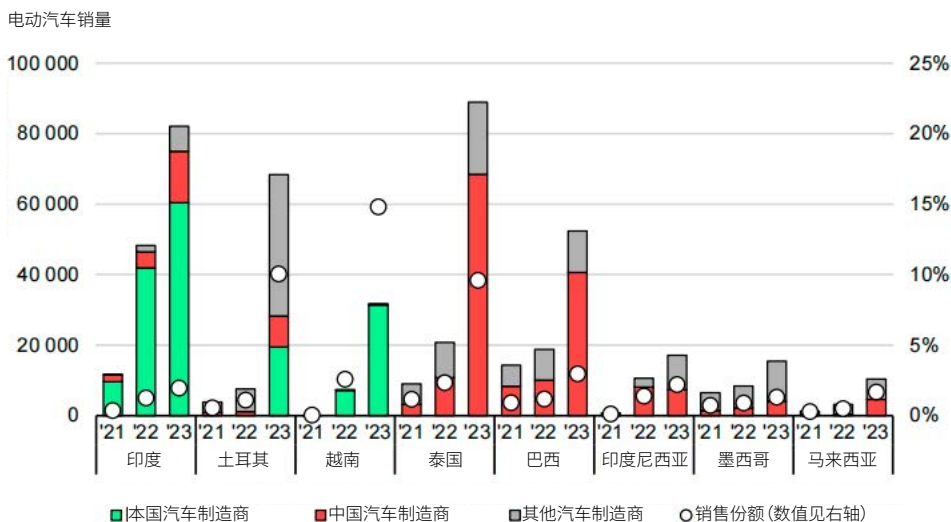


相关汽车制造商占全球电车市场的份额(左图) 和相关汽车及设备制造商的毛利润率(右图) (2015-2023 年)



注：市场份额按全球电动汽车销量计算，包括纯电动汽车和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销量。图表中“全球主要汽车制造商”包括宝马、福特、通用、本田、现代、起亚、梅赛德斯-奔驰、日产、雷诺、Stellantis、丰田和大众等，“中国汽车制造商”是指除比亚迪以外的 33 家中国车企。2024 年和 2025 年的毛利润率根据相关公司发布的年报估算。
数据来源：国际能源署基于彭博社和 EV Volumes 的数据分析得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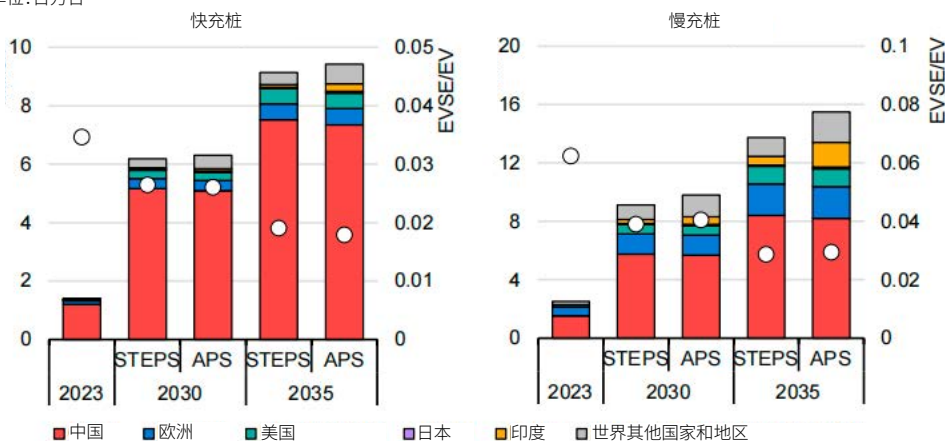
按制造商国别统计的不同国家的电动汽车销量 (2021-2023 年)



注：在涉及国际汽车制造商与中国汽车制造商的合资企业时，若存在车型数据，销售量将依据其归属国家进行统计。例如，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五菱车型，其销售量依据中国品牌汽车制造商来源统计。
数据来源：国际能源署基于 EV Volumes 的数据分析得出。

不同国家或地区预计安装的轻型车公共充电桩数量 (2023-2035 年)

单位:百万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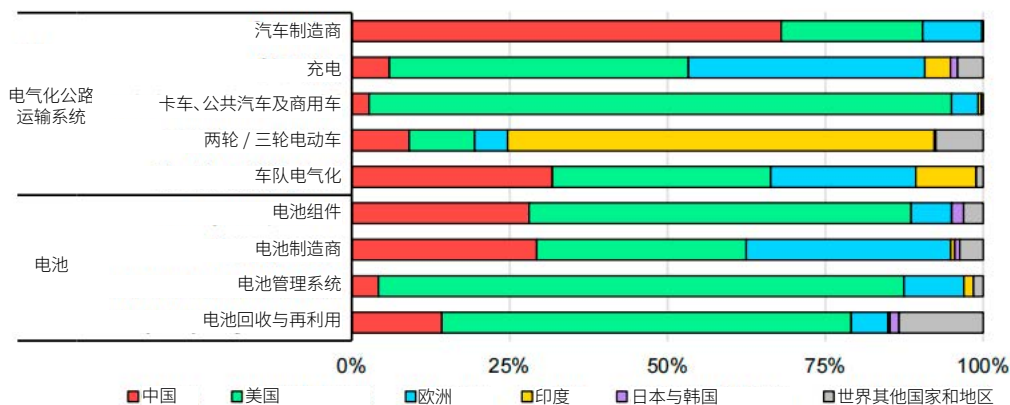


EVSE/EV: 电动汽车充电设备 / 电动汽车 (数值见右轴)

STEPS: 既定政策情景 APS: 已宣布承诺情景

注: 通过交互式平台全球电动汽车数据浏览器, 用户可以查询不同国家或地区电动汽车充电设备的预测数据。

按技术类别、国家或地区统计的电动汽车领域累计风险投资 (2018-2023 年)



注: 包括初创期和发展期交易数据。国家或地区的确定基于公司总部所在地, 而非投资来源地。图表中“欧洲”包括欧盟成员国、挪威、瑞士和英国。

数据来源: 国际能源署基于清洁技术集团 i3 数据库的数据分析得出。

数据来源: 国际能源署 4 月 23 日发布的报告《2024 年全球电动汽车展望》

新能源汽车： 驶向可持续未来的绿色引擎

策划执行 / 《中印对话》编辑部

新能源变革的领航者

张奕凡

职业：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博士生

出生地：四川攀枝花

现居地：云南丽江



在当今全球汽车产业版图中，科技创新与能源变革的浪潮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席卷而来，不仅重塑了行业格局，更深刻影响了人们的出行方式与生活理念。新能源汽车，作为这场变革的核心驱动力，正迅速崛起为全球瞩目的焦点。

随着全球公民环境保护意识的日益增强，新能源汽车以其低碳环保的特性，赢得了消费者的青睐。特斯拉的前瞻性技术和颠覆性产品设计，引领了全球新能源汽车的潮流；而国内科技公司如小米，则以深厚的科技底蕴和敏锐的市场洞察力，跨界进入新能源汽车领域，

并迅速积累起大量忠实用户。这一趋势彰显了新能源汽车市场的巨大潜力，也反映了全球民众对于可持续发展未来的共同追求。

中国新能源汽车的快速发展，得益于多方面的优势条件。首先，中国拥有完整且高效的工业体系和产业链，为新能源汽车的研发、生产提供了坚实的支撑。其次，庞大的内部消费市场为新能源汽车提供了广阔的销售空间，推动了产业的规模化发展。此外，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扶持，从政策引导到基础设施建设，全方位促进了新能源汽车产业的蓬

勃发展。中国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完善的路网和广泛分布的公用充电桩网络，为新能源汽车的普及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同时，一系列优惠政策不仅降低了消费者的购车成本，也激发了市场活力，推动了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持续创新。

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中国新能源汽车正以前所未有的开放姿态走向世界。中国制造业的强大产能和技

升空间。行业需在保持外观吸引力的同时，深化内在核心技术的研发与突破。外在的炫酷造型虽能短期吸引眼球，但唯有核心技术才是驱动行业持续进步与创新的源泉。

展望未来，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正站在一个新的起点上，既面临挑战也孕育着机遇。随着全球新能源汽车市场的蓬勃发展及消费者偏好的多元化，行业需紧抓机遇，聚焦产品创新与品质提升，强化核心

“ 尽管中国新能源汽车凭借亲民价格与时尚设计在社交媒体上赢得了年轻消费者的青睐，其国际市场占有率尚存提升空间。行业需在保持外观吸引力的同时，深化内在核心技术的研发与突破。”

术实力，为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平衡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比亚迪等国产新能源汽车品牌在泰国等东南亚国家市场取得了显著成就，提升了中国新能源汽车的国际知名度，也为当地绿色出行提供了更多选择。

尽管中国新能源汽车凭借亲民价格与时尚设计在社交媒体上赢得了年轻消费者的青睐，其国际市场占有率尚存提

竞争力，灵活应对不同国家和地区市场的独特需求。同时，加强品牌塑造与营销策略的国际化布局，深化国际合作，积极融入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吸收并转化国际先进理念与技术，加速在全球市场的拓展步伐。在科技革命与能源转型的双重驱动下，相信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能以前所未有的勇气和决心，向着更高更远的目标迈进。

印度的新能源革命

希瓦姆·卡拉 (Shivam Kaila)

职业：印度巴哈大学博士生

出生地：印度喜马偕尔邦昌巴

现居地：印度喜马偕尔邦索兰



印度作为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之一，正处于汽车电气化快速发展的关键阶段。印度的电动车市场覆盖了数百万辆踏板车、三轮车、摩托车和汽车，是全球增长最快的电动车市场之一。随着消费量和销售量逐年攀升，电动车在印度的市场前景十分广阔。中央和地方政府以及私营企业等多方力量正共同推动这一进程，预计印度电动车市场将持续繁荣。

为了提升电动车市场的竞争力，印度制定了雄心勃勃的目标，并推出了一系列政策和计划。其中，“电动出行国家计划”尤为重要，它鼓励民众更多使用电动车出行，旨在减少印度作为汽车大国对原油的高度依赖。

印度蓬勃发展的电动车市场引起了国际广泛关注。《印度2023年经济调查》预测，到2030年，印度电动车的年销量将突破1000万辆，有望直接或间接创造多达5000万个就业岗位。据业内估计，2022年印度电动车的总销量已经达到100万辆。为应对激增的市场需求，印

电动车的销量大幅增长，环比增长34.42%。第四季度也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销量再创新高，达到76301辆。《印度2023年经济调查》预测，2022年至2030年期间，印度国内电动车市场的年复合增长率将达到49%，展现出强劲的发展潜力。

印度国内多个邦政府也在

映了印度新能源车市场的新趋势。在印度北部和西部地区，电动三轮车广泛用于“最后一公里”的出行。然而，这类车辆的效率相对较低，单次充电的平均续航里程仅为80公里，且普遍使用寿命仅9至11个月的铅酸电池。

为了更全面地了解印度新能源车市场的发展现状，可以通过SWOT分析进行考量。印度市场上电动车的优势包括环保、更少的噪音污染、较低的使用成本、更简化的机械结构以及运营成本的降低；劣势则体现在充电时间较长、充电基础设施不足以及电池购置和更换费用较高。尽管如此，印度新能源车市场依然有广阔的增长空间，包括经济增长的潜力、政府补贴和税收减免政策，以及燃油成本上升带来的经济收益。与此同时，它也面临着一些潜在威胁，如电力成本可能上涨、混动汽车和氢动力汽车等新型交通工具带来的竞争，以及对压缩天然气产业等传统燃料行业的挑战。

印度作为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快速发展的经济体，具备成为全球电动车市场重要参与者的潜力。印度电动车的广泛普及，将标志着全球出行向可持续发展迈出的重要一步。

“作为世界第三大石油进口国，印度正在加速向电动车转型，努力减少对石油的依赖。如果印度能够实现其电动车普及目标，将有望成为新兴经济体的典范，推动全球出行方式的绿色革命，并对全球石油市场产生重要影响。”

度政府出台了财政激励政策，支持本土电动车制造业的发展。政府已批准扩大国家生产挂钩激励计划，计划支出1810亿卢比用于支持先进化学电池的生产，另计划支出2605.8亿卢比用于支持汽车、汽车零部件和无人机行业的发展。

VAHAN是印度国家交通项目下的电子政务旗舰平台，旨在实现全国范围内交通中心的自动化运营，包括车辆注册、许可证发放、税收管理和执法等功能。根据VAHAN的数据，2023-2024财年第三季度，印度两轮

积极推动新能源车的使用，如阿萨姆邦、特伦甘纳邦、泰米尔纳德邦和古吉拉特邦等都已出台了相关政策，鼓励居民选择电动车作为主要的交通工具。作为世界第三大石油进口国，印度正在加速向电动车转型，努力减少对石油的依赖。如果印度能够实现其电动车普及目标，将有望成为新兴经济体的典范，推动全球出行方式的绿色革命，并对全球石油市场产生重要影响。

根据国际能源署的一份报告，印度电动车市场中超过50%的注册车辆为电动三轮车，这反



爱护树木 保护树木

关爱地球之肺 净享清新空气

忆新疆之旅

文 / 潘美丽 (Shikha Pandey)

在为期三周的研修之旅中，我深深感受到新疆独特的文化之美、自然之美和历史之美。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位于中国西北部，是古丝绸之路上重要的贸易枢纽和文化交流中心。近年来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新疆成为了连接中国与中亚、中东地区的重要通道，同时也是连接中巴经济走廊的核心枢纽。

几个月前，中国文化和旅游部在新疆开展了为期三周的青年汉学家研修活动，我有幸代表印度与来自全世界21个国家的代表一起参加了这次活动。一直以来，我对新疆的社会文化了解较少，和我在中国去过的其他地方相比，新疆是最具特色的。它不仅拥有迷人的自然风光和悠久的历史文

资源，各民族在此安居乐业。通过这次研修之旅，我从多个视角感知了新疆的发展变化。

新疆是个好地方

新疆地形复杂，高山环绕，多盆地和沙漠，但这里却不乏先进的基础设施，这样的基础设施往往是在北京、上海、重庆、深圳等现代化大都市才能看到的。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首府乌鲁木齐，随处可见高楼大厦、大型商场、宽阔的道路、立交桥、地铁站、公交车站、银行、大学以及麦当劳、肯德基、汉堡王等跨国快餐连锁店等。与北京、上海等中国最发达的城市相比，乌

鲁木齐的生活成本很低，在这里不用花那么多钱也能享受到与一线城市同样品质的餐饮和公共交通。乌鲁木齐市内还有许多大型公园，人们可以在那里放松身心，欣赏城市美景。

在街道上，我可以遇见来自汉族、维吾尔族、回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等各个民族的人。在乌鲁木齐生活的外国人并不多，因此当地人对到访的外国面孔表现得有些好奇。在乌鲁木齐和喀什的街头，我多次被问起来自哪个国家，也有不少人猜到我是印度人，当他们知道我来自印度时，显得格外兴奋。印度宝莱坞在当地颇有影响力，他们当

中有很多人通过宝莱坞电影认识了沙鲁克·汗和阿米尔·汗。我在街上遇到的孩子们也都兴高采烈地与我合影。

作为一名青年汉学家，语言对我来说没什么障碍。我便四处走走看看，与当地入谈天交流。乌鲁木齐的夜生活同样精彩，许多街头小吃摊、酒吧等娱乐场所都营业到深夜。我还在街上碰到了几名正在品尝街头小吃的印度医学生，他们来自班加罗尔、德里和斋浦尔等地，目前在新疆医科大学攻读医学专业。

新疆的地理位置得天独厚，自然风光秀美，地形地貌令人惊叹。新疆北部耸立着阿尔泰山，雪峰林立；中部是同样白雪皑皑的天山，以及中国内陆最低的盆地——吐鲁番盆地，这里有些区域的海拔甚至低于海平面；南部有昆仑山、塔里木盆地和塔克拉玛干沙漠，其中塔里木盆地被称为欧亚大陆最干旱的地区。

研修期间，我有幸游览了天山、天池、吐鲁番、交河古镇、千佛洞等景点，以及古丝绸之路最重要城市之一——历史名城喀什。最让我惊叹的是拥有2000多年历史的交河古镇和千佛洞壁画，它们至今还保持着最初的模样。千佛洞保留下了印度与中国开展宗教交流的历史痕迹。古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深深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如今在中国仍能看到佛教深远的影响。这些非凡的自然景观和重要的历史进程至今仍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新疆

既保留了原生态的自然环境，又拥有充满活力的文化氛围，值得人们探索和了解的太多太多。

我们还参观了昌吉市著名的西域春乳制品厂，了解到中国工厂如何将先进的技术运用到工厂运营和大规模生产中。昌吉国家农业科技园区也值得一看，园区面积很大，有一个大花圃和很多温室大棚，种植有机蔬菜等农产品。此外，我们还参观了昌吉和吐鲁番地区的葡萄和棉花种植园，品尝了来自哈密地区著名的哈密瓜，新疆出产的优质水果有很多，如石榴、葡萄、甜瓜、苹果等。在吐鲁番我第一次看到了苹果树，于是欣喜地从树上摘下一颗苹果，每一口咬下去都是甜蜜的滋味。

文化交融之地

新疆历史文化遗产丰富，许多艺术和民俗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蓬勃发展。在当地人的日常生活中，很容易感受到他们的语言、艺术、文化与历史上丝绸之路所连接的其他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关联。街头巷尾常有当地人在演奏乐器，他们使用的许多弦乐器都与印度的传统乐器相似，如西塔琴、萨洛琴、萨兰吉琴和迪尔鲁巴琴等。当地的维吾尔族、哈萨克族、乌孜别克族等都有自己独特的歌舞风格，和他们一起表演让我乐在其中。在逛国际大巴扎时，我们也遇到了一大群当地人在跳舞，于是很开心地加入他们，在欢快的音乐中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夜晚。

个愉快的夜晚。

新疆的刺绣艺术品也与印度刺绣十分相似。当地人偏爱鲜艳的色调，以红色为主，他们还喜欢在设计中使用各种动物元素，如羊角、凤凰等，印度的刺绣艺术同样从自然界中汲取灵感，包括鸟类生物、花卉图案和各种曼茶罗图案。在维吾尔语中，有些特定的词汇与印地语很相似，因为这两种语言都曾受到波斯语的影响。例如，维吾尔语和印地语中表示洋葱的词“Piyaz”、表示杏仁的词“Badam”和表示书的词“Kitab”等都来自相同的词源。这些文化共通之处表明，新疆在促进多元文化交流方面作用重大，是实践“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节点。

当前，新疆在各个领域飞速发展，未来潜力巨大。新疆的自然人文魅力以及当地人谦逊和善的品性，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与中国其他地区相比，新疆的文化多样性和多元文化融合的特点格外突出。新疆和印度在文化上的诸多相似之处，也帮助我更加深刻地理解和认识这片土地。

本文作者潘美丽(Shikha Pandey)是北京语言大学的博士研究生，2017年她从天津师范大学取得硕士学位，曾在印度孟买大学担任助理教授。

泰戈尔的中国缘

文 / 谭中

泰戈尔高度赞扬中国与中华文明。他在中国讲演时说：“你们的古老文明使心灵的土壤变得肥沃。它永恒的人道风格使得属于它的所有一切都富有生命力。如果不是显著的人道主义，如果不是它精神生命的丰富，这一文明是不会持续这么久的。”



《泰戈尔：中国之旅》

孙宜学 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3年5月

读了孙宜学教授的《泰戈尔：中国之旅》一书使我非常激动。泰戈尔是我父亲谭云山一生中最关键的友人兼导师。谭云山和泰戈尔成为增进中印友谊与了解的紧密同志与合作伙伴，共同建立“中印学会”与国际大学的“中国学院”。我不但在襁褓（刚生下两个月）时期获得泰翁给予的印度名字“Asoka”，而且是在泰戈尔灵感照耀下追随父亲的学术事

业，毕生奉献给“中印学”与“中印大同”（Chindia），“春蚕到死丝方尽”。我经常想：没有泰戈尔就不会有谭云山，就不会有谭中，自己这一生的事业是泰翁给我印度名字时就注定了的，我别无选择，也义无他顾。

中国两千多年历史上有过成百的、外来（多半来自印度）的、坚持俭朴生活的、从不想家、四海为家的高僧，1924年4月29日至5月4

日，泰戈尔住在北京清华大学校园中，他忽然对梁启超说，他怎么觉得到了中国就像回家一样，可能他前世就是那些来华高僧之一。泰戈尔的的确确是继承了古人那种把宇宙当做祖国的国际主义者。他在1916年写道：“我们将在人—神大道上漫步，高唱超越人类之歌……我们会把那伟大世界的大道当做自己的国家。”他不但憧憬着超越国界的大道，而且试图在现代狭隘民族主义荆棘丛生的地球上走出这条大道来。他于1920年12月从纽约写信给正在他办学的印度和平乡访问的中国作家许地山说：“对我们来说，只有一个国家，那就是世界。我们只有一个民族，那就是人类。”他又说：“让那幻觉中的地理障碍至少在印度的一块地方消失，让和平乡变成那块地方吧！”泰戈尔把他办的学校取名为“Visva-Bharati”。这个名字是泰戈尔把古印度《吠陀经》(Veda)上一句格言“yatra visvam bhavati ekanidam”（全世界在一个鸟巢中相会）压缩而成，中国通常说的泰戈尔的“国际大学/Visva-Bharati”，真正的意思是“使世界聚会的鸟巢”。

泰戈尔对中国的深厚感情是在他1924年访华之前就奠定了的。一方面因为他是国际主义者，另一方面，



1924年，泰戈尔访华时与欢迎者在一起。左起为梁思成、张歆海、林长民、恩厚之、泰戈尔、林徽因、徐志摩。

他的家庭背景就是对中国向往的。他的祖父德瓦侃纳特·泰戈尔(Dwarkanath Tagore)和中国有生意来往，他父亲迪本德拉纳特·泰戈尔(Debendranath Tagore)曾于1877—1878年唯一的一次出国远行就是到中国访问。父亲迪本德拉纳特从中国回家以后又是写文章，又是和亲朋好友谈论中国。印度民间有闲谈的嗜好，孟加拉人更是滔滔不绝。我们可以想象泰戈尔的父亲从中国回去后在大家庭几十人的集体中掀起的谈论中国的热烈，对当时还不到20岁的泰戈尔来说一定是影响很大的。3年以后(1881年)，20岁的泰戈尔就用孟加拉文发表一篇文章，题目是：“在中国的谋财害命贸易”(Chine Maraner Byabsa/Death

Traffic in China)。文章谴责英国对华的鸦片贸易与鸦片战争。他在1921年先用孟加拉文、然后翻译成英文发表的《文化的团结》(Sikshar Milan/Union of Cultures)的文章中写了这样一段话：“佛陀感觉到人类是伟大团结的合成，他的启示传到中国变成不朽泉源中发出的力量。可是，现代要建立帝国的商人为了贪婪，背弃了这一团结的真理，竟无耻地把致命的鸦片毒物送到中国，不，是用炮口硬塞进中国的喉咙。”

泰戈尔1923年接到中国邀请信后非常激动。那时中国兵荒马乱，中国到处都是土匪的信息在全球风传，泰戈尔颇有所闻。但他那人类“性善”的信念以及盼望观光中国的饥渴使他产生一种想要在中国被

土匪绑架的新奇念头。1923年11月他病好了以后写信给一位比他年轻得多的女友人，其中这样写道：“如果那儿（中国）的土匪把我绑架，我就可以好好休息几天。但不知道他们会要求多少赎金——我想大概不超过二三十万。不过要看我的同胞能不能凑齐这笔钱。如果凑不齐的话，那我就得留起辫子，讨个中国老婆，在中国快快乐乐过日子了。”许多年后，泰戈尔在波斯访问时谈到他在中国想被土匪抓去的念头，他的波斯朋友对他说，中国土匪尊敬长老，不会抓你这种模样的人。如此看来，泰戈尔这想让中国土匪绑架的奇想还不是昙花一现的念头，我们从这一点上也看出他是对中国感情特别丰富的慈祥老人。

泰戈尔1924年访华时已超越花甲“耳顺”之年。他在北京美好地度过63岁（按中国算法是64岁）寿诞，那次生日成为他一生中最难忘的一天。他在临终前不久作诗写道：

……

记得我去中国
陌生人在我前额
点了友谊的红色，
称我为亲者。
不知不觉地
陌生感消失。
意料不到的
欢乐情谊显现

一个永恒的人。
我得了中文名，
身穿中式裳。
我心中豁然开朗
友谊来临
使我新生。
他赐给我生命之珍。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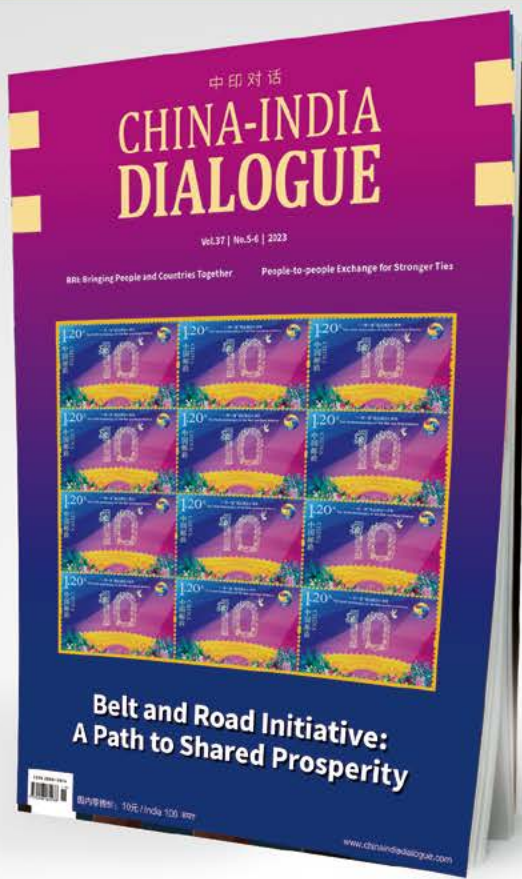
泰戈尔一生不知出外旅行多少次、不知访问过多少国家，也在国外度过生日，却没有作过第二首这样兴奋的外访回忆诗，没有在别的写作中这样生动地回忆自己生日的细节，没有这样用中印友谊“使我新生”、象征着“神”所赐予的“生命之珍”来形容过他在别国享受的国际友谊。这短短的几句话中真不知蕴藏着多少值得大书特书的泰翁与中国的交融与激荡的精神财富，值得我们好好发掘。

泰戈尔高度赞扬中国与中华文明。他在中国讲演时说：“你们（中国）的古老文明使心灵的土壤变得肥沃。它永恒的人道风格使得属于它的所有一切都富有生命力。如果不是显著的人道主义，如果不是它精神生命的丰富，这一文明是不会持续这么久的。”“我曾经对自己说：中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我记得曾经对那些毫不尊重你们、到这儿来剥削你们以及对你们文明所作贡献忘恩负义的人表示愤怒。”

泰戈尔在1924年对华讲

演时就已提到，但在1937年国际大学中国学院开幕典礼上完整表达出下面这段赞赏中国文化的颇为新颖的话：“没有任何更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文明漂亮的精神使得人们爱物质却毫不贪婪，使他们喜爱这世界的事物，给它们披上温柔仁慈的外衣，他们自己没有变成物质主义者。他们本能地掌握了事物旋律的秘密——并不是科学中强力的秘密，而是表现的秘密。这是伟大的本领，因为只有神才能知道这一秘密。我羡慕他们这种本领，希望我们同胞能与他们分享。”^[4]

本文作者谭中为世界著名的印度华裔中国学家。本文摘编自《泰戈尔：中国之旅》一书序言。



沟 通 中 印



关注我们的
多媒体平台



联系我们: contact@chinaindiadialogue.com

WWW.CHINAINDIADIALOGUE.COM

人民畫報

China Pictorial Publications

China Pictorial
(English)



China-India Dialogue
(English, Chinese, and Hindi)



China Pictorial
(Chinese)



China
(Russian)



New Silk Road Review
(Russian, Chinese, and Kazakh)



A Window to the Nation A Welcome to the World
Chinese Passion Global Vision

Advertisement hotline: 86-10-8841 7354 / 7355 / 7419